

2022年最新写材料可参考 理论文章合集



办公室工作材料库



领导讲话提纲



老同志说



干部读书

（说明：本合集内容除原创外，全部整理自各级政府网站、各专业领域媒体、杂志、图书等，已经编辑甄别筛选修改，均可复制粘贴，绝对保证质量。请大家在学习参考过程中严禁抄袭，严禁上传网络或者用于商业用途，违者必究）

目 录

1... 【理响中国】从中西对比视域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人民性	4
2... 【理响中国】走好“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10
3... 【读懂新飞跃】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科学理论指南	16
4... 【读懂新飞跃】全面从严治党：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鲜明特征	24
5... 【实践新论·非凡十年】加强示范引领，建设美丽中国	30
6... 【实践新论·非凡十年】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标杆和高质量发展示范者	36
7... 【实践新论·非凡十年】以“五链重构”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42
8... 【实践新论·非凡十年】实现“双碳”目标贵在统筹兼顾	49
9... 【实践新论·非凡十年】贯彻新发展理念，走好新时代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56

10. 【实践新论·非凡十年】教育与经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63
11. 【实践新论·非凡十年】破解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梗阻，奠定高质量发展雄厚基础	70
12. 【实践新论·非凡十年】不忘初心，让人民过上美好的幸福生活	80
13. 【实践新论·非凡十年】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助力低碳美丽中国建设	88
14. 【实践新论·非凡十年】以更高水平开放推动民族伟大复兴	94
15. 【实践新论·非凡十年】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标杆和高质量发展示范者	101
16. 【学习时刻 金句】爱护、期待青年，为创造历史荣耀和时代辉煌积蓄磅礴力量	107
17. 【学习时刻 金句】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	115
18. 【专论】绘就“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宏伟蓝图	123
19. 【学习时刻 金句】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	129
20. 【学习时刻 金句】以制度型开放引领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	136

21. 【学习时刻 金句】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143
22. 【专论】以马克思主义为引领推进哲学社会科学蓬勃发展	149
23. 【专论】“五个有利条件”：奋进新征程的科学指引	158
24. 【专论】补短板、弥弱项，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主创新	163
25. 【专论】促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提升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169

【理响中国】从中西对比视域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人民性

2022-08-24

从一般意义上讲，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过程，是一个以工业化、城市化、政治民主化、文化世俗化为主要内容的持续而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伴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率先走向现代化国家的刺激示范效应，世界上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都会或迟或早地走向现代化，这是已经为世界历史发展所证明了的普遍历史进程。由于现代化率先发端于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以至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影响都将是持续和深远的。但由于各个国家历史发展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个国家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实现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制度约束、动力机制、优先次序选择以及具体战略等方面必然存在很大差异，不可能千篇一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权利，理应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尊重和理解。

西方式现代化道路最核心的特征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

价值，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体现的是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关系，是以物的形式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的范畴。追逐剩余价值、追逐利润，是资本与生俱来的本性。因此，为了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获取更大的利润，资本一方面成为资产阶级残酷剥削工人阶级、进行殖民掠夺的工具，另一方面，它也产生了“伟大的文明作用”，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它推动建立了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打破了各国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促进了世界各国之间和个人之间的交往和联系。资产阶级还摧毁了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建立起了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可见，西方方式的现代化道路是一条受资本主宰的现代化道路，是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人与自然相互割裂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

西方式现代化道路是基于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路径依赖以及特定的阶级阶层结构而形成的，并不适合所有的国家和民族。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和独特的文化传统，近代以来又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而言，试图全盘照搬或模仿

西方式现代化道路显然是行不通的，只会变成帝国主义列强的附庸而遭受更加深重的剥削和压迫。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探索现代化的各种方案及其失败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中国式现代化，是党和人民经过长期探索形成的人类现代化新道路，它建基于社会主义的价值立场和制度框架之内，从根本上突破了西方式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老路，建构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实现了人类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新突破，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式现代化道路，说到底追求资产阶级少数人利益最大化的实践过程，资本成为主宰社会的根本逻辑，现代化过程受制于资本、听命于资本、服务于资本，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本质上处于受压迫、受剥削、被统治的地位。而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工人阶级政党，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

众的根本利益、追求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由，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价值立场。中国共产党所奋斗争取的一切就是为了实现和满足人民的利益，坚持人民至上，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立场。正是这一根本政治立场，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无论是领导革命、建设、改革，还是带领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都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把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坚持将人民作为现代化事业最可靠的动力。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要在社会内部孕育出推动现代化的强大动力才能取得成功。西方式现代化的动力来自于资本无休止的逐利本性，正是依靠资本的这一本性，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产阶级才迸发出了强大的创造力和竞争力，推动西方式现代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我们也要充分利用资本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但决定现代化事业发展方向及其成败的归根结底是人而不是

“物”。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民是历史的主体，必须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马克思曾指出，在整个历史发展的无限过程中，“人始终是主体”“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依靠人民、

为了人民，在长期的奋斗过程中，党深刻地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中的决定性作用，人民群众不仅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体，而且是推动改革开放的强大力量，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中坚力量。因此，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践进程中，只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尊重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从群众中汲取无穷的智慧和力量，我们就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应对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风险挑战，进而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共同富裕观。西方式现代化道路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它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只能是两极分化。当今美国社会出现的贫富分化、社会结构极化、政治撕裂等现象，正是这种现代化道路所带来的必然后果。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在规定性。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坚持把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现代化的崇高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不断迈进”。党的十九大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内容之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并提出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必须明确，共同富裕并不单纯是指物质生活的富裕，而是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这就进一步明确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必然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促进的现代化，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代化，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根本宗旨的回归，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质的体现，是对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根本性超越。

【理响中国】走好“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2022-08-22

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方面特征，其中就包括，我国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深刻把握这一论述的本质内涵，就必须将中国共产党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理论置于中国共产党有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历史长河和现实实践中，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特质、来龙去脉以及当前乃至未来的实践走向。

中国共产党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历史探索 具有一脉相承性特征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个不断探索的历史过程，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理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具有高度的一脉相承的赓续性特点，凝聚了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精华和思想智慧。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紧密结合，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有着科学的认识，这不仅体现在对相关学理的准确把握，而且也大量将其应用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之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认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实现。甚至“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他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进一步提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理论和实践不断深化，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任务，并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设的脚步跨过千禧之年时，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理论要旨，也是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全面继承和深刻诠释。他强调，两个文明建设缺少任何一个方面的发展，都不成其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胡锦涛同志指出，必须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

合起来，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理论在我国新时代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创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理论推向了新境界，也在实践创新层面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建设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同时强调我国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因此，要“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践塑造出更具高度的中华文明新形态。绵延五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是支撑华夏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但当中华传统文化遭遇现代文明的冲击时，如何让中华传统文化形态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的限制，构成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核心要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高度协调起来，一方面通过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创造出体量更大更为丰富的物质基础，以高质量发展方式不断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美好生活需要；另一方面通过不断创新精神文明建设实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不断满足我们对精神文化的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中华传统文明形态推上历史新高度的同时，实现了对以往中华传统文明形态和当代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双重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践展现出向上向善的中华民族精神特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在统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中，不断塑造着向上向善的中华民族精神特质。当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华大地上疯狂肆虐之际，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和生命至上的价值取向，充分掌握和利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系统性方法，以特有的制度优势将物质资源和精神力量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合力，既充分发挥出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强大的物质创造能力，又调动其全国人民众志成城、顽强奋斗的民族精神，充分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磅礴伟力和中华民族向上向善的精神传统。新冠肺炎疫情对于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是一场大考，14亿中国人民构筑起气势磅礴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之堤，在勠力同心、团结协作、坚持不懈的实际行动中迎面这场苦难和危机，答好这张堪称世纪浩劫

的“生死答卷”，体现出中华民族精神的强大引领力、生命力和战斗力。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践向世界展示出勇于担当、自信开放的大国形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勇于担当、自信开放的实践中，承载着一个东方文明大国的国际形象。2022年，面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依旧十分严峻的艰难状况，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得以成功举办，向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奉上了一份“珍贵礼物”。在这种苦难和危机层层在世情之下，成功举办冬奥会不仅是一国综合实力的象征，其背后更需要强大的民族精神力量支撑。北京冬奥精神被总结为“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是中国式现代化大国形象的集中体现。这种宝贵精神具有深刻的意义：要以胸怀大局的精神格局勇挑重担，以自信开放的从容心态面向世界，以迎难而上的顽强品格勇往直前，以追求卓越的专注精神精益求精，以共创未来的团结立场携手共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铸就了成功举办冬奥会的“中国自信”，强大的物质基础和精神伟力造就了“中国力量”，从而向世人展示出勇于担当、自信开放的大国格局、大国风范。

不难看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结合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有着最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其深厚的理论根基，而且还遵循着清晰明确的历史发展逻辑。我们坚信，新时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结合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一

定会在守正创新中，不止于古步，不泥于一曲，不断走向更加丰盈的美好未来。

【读懂新飞跃】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科学理论指南

2022-07-27

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新时代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强大人民军队、怎样建设强大人民军队，作出一系列新的重大判断、新的理论概括、新的战略安排，形成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最新成果——习近平强军思想。党的十九大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并郑重写入党章。习近平强军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新飞跃，全面推进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必须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理论指南和行动纲领。

【读懂新飞跃】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科学理论指南
(海报：杨经国)

一、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新飞跃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同中国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实践相结合，创立并发展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先后形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胡锦涛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等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成果，回答和解决了不同历史条件下我军建设发展和战略指导的历史课题，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思想宝库。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再一次与时俱进，形成了习近平强军思想。它紧紧围绕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大时代课题展开，涵盖新时代军队建设、改革和军事斗争准备各领域各方面，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相互贯通的科学军事论体系，包括明确强国必须强军，巩固国防和强大人民军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必须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一致，力争到 2035 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明确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建军之本、强军之魂，必须全面贯彻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度，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明确军队是

要准备打仗的，必须聚焦能打仗、打胜仗，创新发展军事战略指导，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作战体系，全面提高新时代备战打仗能力，有效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明确作风优良是我军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必须加强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惩恶，大力弘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明确推进强军事业必须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更加注重聚焦实战、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体系建设、更加注重集约高效、更加注重军民融合，全面提高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水平；明确改革是强军的必由之路，必须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明确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统筹推进军事理论、技术、组织、管理、文化等各方面创新，建设创新型人民军队；明确现代化军队必须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推动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明确军民融合发展是兴国之举、强军之策，必须坚持发展和安全兼顾、富国和强军统一，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习近平强军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贯穿的鲜明主题是强军兴军，根本着眼是以强军支撑强国复兴伟业，核心

要求是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实践指向是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习近平强军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我们党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认识和实践提升到新高度，谱写了党的军事理论与时俱进的新篇章，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新飞跃。

二、推动军事辩证法思想实现新发展

百年来，党的军事指导理论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战争、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基本观点，而蕴含其中的军事辩证法，则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思考军事问题的独特创造，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精髓，也是解决当代中国军事问题的密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创造性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研究和解决当代中国军事问题，深刻揭示了新的时代条件下国防和军队建设规律、军事斗争准备规律、战争指导规律，丰富发展了党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一是提出了一系列军事辩证法的新范畴，诸如中国梦与强军梦、总体国家安全与军事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威慑与实战、遏制战争与打赢战争等，揭示了我国在由大向强、将强未强的关键历史时期，统筹发展与安全、强国与强军遇到的多层次、多方面的矛盾及其内

在关系，大大拓展了我们党对军事和安全领域中新矛盾及其规律的认识。

二是赋予军事辩证法的传统范畴以新内涵，在诸如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战争与政治的辩证法、人与武器的辩证法、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辩证法、全局与局部的辩证法、全面与重点的辩证法等方面，通过赋予传统范畴以新的时代内涵，反映军事领域普遍性矛盾的新变化，形成了破解深层次矛盾问题的新思路、新原则、新举措，成为观察和处理当代军事领域普遍性矛盾和深层次问题的理论武器。

三是提出和强调了一系列思维方法，如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历史思维、底线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等，彰显了习近平主席思考和处理军事问题的总体性、系统性、原则性和创造性。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编写的《习近平强军思想学习纲要》提出，既要系统学习把握习近平强军思想的基本内容，更要掌握强军打赢的科学方法论。在战争观层面，主要包括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军事服从政治、战略服从政略，人是决定因素，武器因素的重要性在上升。在方法论层面，主要包括坚持问题导向、勇于攻坚克难，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知行合一、实干兴军。这些是习近平强军思想活的灵魂，为我们从政治上全局上观察和处理军事问题提供了根本指导，也彰显着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在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强烈使命担当、深沉忧患意识、科学思维方法、鲜明问题导向、严实精神作风，展现出习近平强军思想独具特色的理论品质和富有感召的思想力量。

三、推动强军兴军事业取得新变革新成就

理论产生于实践，又指导着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防和军队建设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导之下，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

确立新时代强军目标，擘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蓝图。基于中国梦和强军梦，确立把我军建设成为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并制定到 2027 年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到 2035 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加快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重振政治纲纪，坚定不移推进政治整训，有效解决弱化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突出问题。一个时期，人民军队党的领导弱化问题突出。对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狠抓全面从严治军，果断决策整肃人民军队政治纲纪，在古田召开全军政治

工作会议，对新时代政治建军作出部署，恢复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以整风精神推进政治整训，全面加强军队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

重塑组织形态，大刀阔斧全面深化改革，有效解决制约我军建设的体制结构突出问题。当今世界新军事革命深入发展，战争形态发生历史性演变，破解我军长期积累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任务艰巨繁重。党中央把军队改革纳入党和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布局，领导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重构人民军队领导指挥体制、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军事政策制度，裁减现役员额三十万，形成了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新格局。

重整斗争格局，坚定捍卫国家核心利益，有效解决军事力量运用进取性主动性不足的突出问题。面对尖锐复杂的国际局势，党领导创新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调整优化军事战略布局，强化人民军队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战略功能。坚定灵活开展军事斗争，有效应对外部军事挑衅，震慑“台独”分裂行径，遂行边防斗争、海上维权、反恐维稳、抢险救灾、抗击疫情、维和护航、人道主义救援和国际军事合作等重大任务。

重构建设布局，创新发展理念和方式，有效解决我军建设聚焦实战不够质量效益不高的突出问题。面对世界新军事

革命，实施科技强军战略，建设创新型人民军队，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后勤，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实施人才强军战略，确立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明确军队好干部标准，推动构建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锻造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过硬部队。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紧紧扭住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扭住能打仗、打胜仗这个根本指向，壮大战略力量和新域新质作战力量，加强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和能力建设，大力纠治“和平积弊”，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建设强大稳固的现代边海空防。

重树作风形象，强力推进正风肃纪反腐。一个时期，我军存在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突出问题。军委制订出台一系列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深入推进军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查处郭伯雄、徐才厚、房峰辉、张阳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并彻底肃清其流毒影响，推动人民军队政治生态实现根本好转。

【读懂新飞跃】全面从严治党：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鲜明特征

2022-07-22

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

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与其他革命不同之处就在于：它自己批评自己，并靠批评自己壮大起来。正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消除党内滋生的腐化力量，共产党才得以保持纯洁的无产阶级革命品质。勇于自我革命，既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百年来最鲜明的品格。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勇于自我革命的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围绕政治路线问题、组织思想不纯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自我革命。从八七会议、古田会议到遵义会议再到延安整风，党以自我革命精神主动纠正错误、总结经验、完善自身、走向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又在国家建设中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并同反革命集团等进行了坚决斗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主动直面问题，刀刃向内解决问题，积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提升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

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于党的建设各方面，以其丰富内涵诠释了自我革命的内在要求。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要求增强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以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实现管党治党真正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面对“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这一根本问题，1945年，毛泽东同志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可以说，全面从严治党不仅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更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

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反腐败斗争的“新理念”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腐败现象不是人类社会从来就有的，它是私有制以及国家的伴生物”，消除腐败的根本措施在于消灭私有制，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廉价政府”，“防止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由社会公仆变成社

会主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时刻怀揣身为共产党人的公仆情怀，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在实际工作中形成一系列关于反腐败斗争的创新理念，构建起党全面领导的反腐败工作格局。

一是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他把高压反腐作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主要抓手，始终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以零容忍的态度、猛药去疴的决心、刮骨疗毒的勇气、严厉惩处的尺度一查到底，严肃追究；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绝不为一少数腐败分子得罪十四亿中国人民。

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充分发挥党内外监督机制、法规制度和廉洁自律的思想道德防线的约束作用，彻底清除滋生腐败的“温床”。

三是强调反腐败斗争的关键在“常”“长”二字，也就是要“经常抓”“抓经常”“长期抓”。要以持久战的恒心、决心、耐心和坚定的政治立场、政治觉悟、政治执行力，一刻不停地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调查 438.8 万件、470.9 万人；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72.3 万起，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64.4 万人；运用“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 1134.4 万人次（截至 2022 年 4 月）。同时，党推动反腐败斗争与打击黑恶

势力保护伞同步进行，严肃查处了云南孙小果等重大黑恶案件背后的腐败和“保护伞”问题。

经过十年来常抓不懈的努力，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赢得了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衷心拥护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全党高度团结统一、走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动。

构建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的“新机制”

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一直是我们党管党治党的独特优势和重要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注重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同向发力，不仅科学阐明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深刻揭示了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规律，更推动了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推进党内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以党的创新理论凝神铸魂，用党的理想信念“补钙”“壮骨”，接续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及党史学习教育等5次较大规模的党内教育。同时，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的实施细则》等，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全面实现了党的领导有章可循、管党治党有规可依的目标任务。截至 2021 年 7 月，全党现行有效党内法规共 3615 部，其中，中央党内法规 211 部，部委党内法规 163 部，地方党内法规 3241 部，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坚持查处违纪违法问题制度化、经常化，让制度、纪律成为带电的“高压线”，从根本上增强制度执行力。在思想和制度同向发力下，全党理想信念更加坚定，遵规守纪更加自觉，党的建设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明显提高，我们党依靠思想政治工作、依靠纪法制度约束推进管党治党的能力极大增强。

开创了党的组织建设的“新局面”

严密的组织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只有党的各级组织都健全、都过硬，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党的领导才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一直以来，我们党建立了包括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在内的严密组织体系。2021 年底，现有

基层组织 493.6 万个，各级地方委员会 3198 个，机关基层党组织 74.5 万个，事业单位基层党组织 94.9 万个，企业基层党组织 153.2 万个，社会组织基层党组织 17.1 万个，9034 个城市街道、29649 个乡镇、114065 个社区（居委会）、491129 个行政村均已建立党组织，基本实现应建尽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发挥。

在夯实党的组织基础的同时，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注重抓好执政骨干队伍和人才队伍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并提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明确新时代好干部标准，以管好“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集中开展“三超两乱”“裸官”“吃空饷”以及干部档案造假、领导干部违规兼职、因私出国（境）等专项整治，针对干部选任上的腐败，两次修订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强调严把干部选拔政治关、品行关、能力关、作风关、廉洁关，有力纠正了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党对人才工作的领导全面加强，人才队伍快速壮大，人才效能持续增强，人才比较优势稳步增强，逐步形成了一支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结构不断优化、作用日益突出的人才队伍。

【实践新论·非凡十年】加强示范引领，建设美丽中国

2022-08-04

美丽中国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美丽省份、美丽城市、美丽城镇、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美丽海湾、“无废城市”等建设示范成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载体。打造各类美丽中国建设样板，发挥示范效应，对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从不同方面部署美丽中国建设，各地积极探索美丽中国建设实践，初步形成了美丽中国建设示范的行动体系。但是还存在东中西示范推进差异明显、示范效应尚未充分发挥、示范合力还需加强等问题。需要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完善美丽中国建设示范系统设计，以点带面促进美丽中国建设整体推进。

强化系统设计，提升美丽中国建设示范新效能

美丽中国建设示范是一项系统工程，辐射范围大、覆盖面较广、涉及领域多，需要遵循美丽中国建设的系统性、整体性特点，强化系统设计，统筹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各领域相关工作，更好地发挥整体效能，协同共进。

早在 2013 年，杭州就开展了美丽杭州建设，成立了美丽杭州建设委员会，相继实施规划纲要、实施方案、行动计划等一系列文件，健全考核评估和奖惩机制，探索形成一套顶层设计、法治保障、科学规划、考核激励、制度创新、工程推进、行动突破、社会共治的美丽杭州建设示范推进模式。除了杭州以外，其他地方在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示范中也形成了很多经验做法。美丽中国建设要以打造这些美丽中国先行示范区为统领，强化系统观念、整体智治，率先探索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促进生态环境质量高位提升、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全域美丽格局加快呈现、生态智治效能全面提升。

然而，当前美丽中国建设示范还缺乏协调议事机制，推进示范实施路径还不明确，存在碎片化和分散化的建设示范现象。这首先需要建立美丽中国建设示范的统筹协调机制，形成高位协调推进、各部门协同合作、社会广泛参与的建设示范机制。其次，要系统谋划美丽中国建设示范顶层设计，制定各领域各类型各地区梯次推进示范建设的时间表、路线

图、任务书。再次，要从组织领导、综合决策、区域协调、监测评估、激励约束和宣传引导等方面，系统构建美丽中国建设示范一体化推进机制。

鼓励地方创新，探索美丽中国建设示范新模式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要求“深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创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和美丽中国地方实践”。近年来，许多地方不断探索创新，奋力打造美丽中国建设地方样板和城市典范，形成一些可供参考借鉴的实践经验。

浙江在持续推进四轮次“811”美丽浙江生态环保行动并率先建成生态省的基础上，开启高水平建设新时代美丽浙江的新征程。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落实国家“双碳”目标、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等新战略新部署，浙江省委提出“推进美丽浙江建设机制性系统性重塑”，包括构建完善绿色低碳转型机制、生态保护修复机制、人居环境治理机制，以及健全美丽浙江建设制度体系和数字赋能美丽浙江治理体系等方面，不断提升美丽浙江建设治理能力。

深圳市提出“率先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典范”，以“全球标杆城市”为目标统领，瞄准2025年、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三个阶段提出美丽中国典范建设目标愿景，重点谋划了高水平建设都市生态、高标准改善环境质量、高要求防控环境风险、高质量推进绿色发展、高品质打造人居

环境、高效能推动政策创新和高站位参与全球治理 7 个领域重点任务，并配套制定每五年的行动方案推进落实，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深圳模式”“深圳方案”。

尽管一些地方在省市等不同层级开展了美丽中国建设实践，但全国来看，美丽中国地方实践和创新氛围尚未形成。各地区，特别是中西部省份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示范实践的责任落实尚不到位、目标和路径还未明确。在引导各地区各层级因地制宜开展美丽中国建设示范实践的同时，要加强美丽中国建设示范的正向激励，进一步鼓励先行示范和探索创新。同时，还要建立健全美丽中国建设示范推广机制，归纳提炼典型成果，及时总结好做法和有效经验，成熟一批、推广一批，引领带动不同类型地区科学有序开展美丽中国建设示范。

注重多方协作，形成美丽中国建设示范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没有哪个人是旁观者、局外人、批评家，谁也不能只说不做、置身事外。美丽中国建设示范同每个人息息相关，因此要调动群众、社会的积极性，构建美丽中国建设示范命运共同体。

2018 年，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共同启动了为期三年的“美丽中国 我是行动者”主体实践工作，实践活动开展三年来，各地四类环保设施开放单位达到一千余家，累计参访

公众超过 8500 万人次；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开展活动近 2 万场，制作推出 4.2 万多种类型各样的生态环境宣传产品，线上线下参与约 15 亿人次，绿色生活生产方式逐渐深入人心。

福建省则坚持生态惠民、共建共享原则，实施全过程公众参与的阳光规划行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美丽福建建设；浙江省积极开展全民总动员，启动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百场万人”环保讲，充分调动社会公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广泛凝聚美丽浙江建设示范各方力量。

从总体上看，在各地美丽中国建设示范中，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尚未全面形成，人民群众观念意识有待进一步提升，公众参与途径较为单一，相应配套政策缺乏等。未来，要持续推动各地美丽中国建设示范共同体建设，一方面要深化各类各级美丽中国建设示范活动，定期开展美丽中国建设示范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进企业、进乡村等活动，创新完善公众参与模式，激发全民参与美丽中国建设的积极性、自觉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要不断宣传美丽中国建设相关知识，弘扬生态人文精神，展示建设示范成就，不断扩大美丽中国建设示范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让美丽中国建设示范理念深入人心。

总之，站在新起点、面向新时期，美丽中国建设示范要迈开步子、蹚出路子，发挥好示范、突破、带动作用，推动

形成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美丽中国建设示范行动体系，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实践新论·非凡十年】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标杆和高质量发展示范者

2022-06-21

建设自贸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从建设自贸试验区，到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目前，全国已设立 21 个自贸试验区及海南自贸港，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的试点格局。为全面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自贸区（港），各地主动扛起“为国家试制度、为地方谋发展”的使命担当，开放新高地“多点开花”，改革试验田“遍地结果”。这些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正逐步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示范者和引领者，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及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正能量。

我国自贸试验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率先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制度体系，打造对外开放前沿阵地，既源于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带来的外部压力，也源于国内外经济竞争形势转变引起的内在需求。一方面，2008 年金融危机后，全球

经济治理平台出现了多边贸易体制停滞、区域合作进程加快的趋势，规则一致、竞争中立、知识产权、环境和劳工标准等为代表的边界后措施成为区域或国家间贸易谈判的主流。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也迫切需要新一轮高水平开放来倒逼国内改革的推进。自贸试验区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肩负起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的重任，探索新途径，闯出新路子，在推动我国对外开放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是前瞻性、差别化、可推广性改革探索不断深化。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核心任务是制度创新，鼓励各地根据各自禀赋特色，开展差别化改革探索。2016 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力争取得更多可复制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进一步彰显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试验田作用”。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2018 年 11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创新若干措施的通知》，推出了 53 项改革措施，加大赋权力度。截至目前，我国自贸试验区已累计在国家层面推出 278 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地方层面推广了约 1400 项制度创新成果，对照各自总体方案，各地改革试点任务实施率普遍超过 85%。278 项国家层面制度创新成果中，涉及领投

资管理领域 76 项，贸易便利化领域 76 项，金融开放创新领域 30 项，事中事后监管 60 项，服务业(人力资源领域)18 项。其中，既有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等基础性、引领性的制度变革，也有“海关通关一体化”等监管模式创新，还有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四个一”等全流程制度优化，这些制度创新成果经过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为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积累了有益经验。

二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开放新格局加快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沿海开放到内陆开放，各地自贸试验区不断推进制度型开放举措，引领带动全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自贸试验区建设 9 年以来，外资负面清单不断缩减，出台了 8 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由最开始的 190 条特别管理措施，缩减到了 2022 年的 27 条，尤其是自贸区版负面清单实现了制造业条目清零，可以认为制造业方面自贸区已经做到了全面对外开放。虽然我国服务业整体开放水平相对不高，但自贸试验区近年来在科技、互联网信息、金融、教育、文化旅游、医疗养老、专业服务等服务重点领域加快开放。例如，海南自贸港作为我国主动开放的重要平台，2021 年推出全国首张跨境服贸负面清单，《海南跨境服贸负面清单》在 120 个左右的分部门，开放水平都超过了 WTO 的承诺，绝大多数甚至超过 RCEP。同时，

自贸试验区借助金融开放前沿阵地的优势，FT 账户（即自由贸易账户）在资本自由流入流出和自由兑换方面率先突破，有效防范金融开放风险的监管政策和促进双向开放的举措，为我国全方位开放创造良好环境。在对外开放新格局方面，沿边自贸区通过寻找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互补优势，探索跨境贸易、跨境物流、双向投资，而内陆自贸区依托航空、铁路等综合交通和物流枢纽，构筑内陆开放新高地，更好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三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涌现。制度创新赋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化模式创新和业态创新，为自贸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创新动力。2018 年 10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广东自贸试验区珠海横琴新区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时强调，横琴有粤澳合作的先天优势，要加强政策扶持，丰富合作内涵，拓展合作空间，发展新兴产业。2020 年 11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要发展更高能级的总部经济，统筹发展在岸业务和离岸业务，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重要枢纽。在数字经济、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海洋经济等新经济领域，各自贸试验区正以更大力度拓展新兴产业增长空间，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在跨境电商、离岸贸易、保税维修、海外仓等外贸新业态方面，自贸区加快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创新，

探索建立适应和引领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国际规则，为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能。在全产业链发展方面，浙江自贸试验区推进以油气全产业链为核心的大宗商品投资贸易便利化自由化，天津自贸试验区打造航空航天全生命周期产业链，江苏自贸试验区探索生物医药全产业链开放创新，等等，为我国产业链安全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四是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曾比喻说，“投资环境就像空气，空气清新才能吸引更多外资”，强调“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重要目标就是要通过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进程中，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逐步推进政府、市场、要素环境深层次变革，在产业协同创新和系统生态培育中发挥支撑引领作用。在贸易便利化领域，通过完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丰富口岸功能、推进海关监管制度创新，自贸区贸易便利化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在投资便利化领域，自贸区率先深化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全面推进商事登记便利化，并在全国率先试点“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破解企业“办照容易办证难”“准入不准营”等突出问题，释放企业创新创业活力。2021年21个自贸试验区利用外资增长19%，比

全国高 4.1 个百分点，以不到全国千分之四的国土面积，实现了占全国 18.5% 的外商投资，外贸进出口增长 29.5%，比全国高 8.1 个百分点，占全国进出口比重的 17.3%，自贸试验区正以优越的营商环境成为名副其实的对外开放高地。

【实践新论·非凡十年】以“五链重构”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2022-07-21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新时代农村改革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是推动农业增效、农村繁荣、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的大背景下，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不仅对激活农村传统产业发展动力、提高农民收入意义重大，而且对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切实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影响深远。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取得非凡成就

近年来，我国农村产业有了长足发展。各地立足农村特色资源，面向市场需求，持续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在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支撑。

一是构建了农业产业体系，提升了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具有资源整合、要素集聚、功能集

合、政策集成等方面的优势，有利于推动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激发各项要素与生产主体活力。首先，促进了农业生产方式转变，推动了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截至今年3月，家庭农场超过380万个，农民合作社达到222万家。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达到95.5万个，服务覆盖全国约38.4%的小农户。其次，优化了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使产业发展更加协调。到2021年，每个脱贫县都形成了2至3个优势突出、带动力强的特色主导产业，脱贫人口人均实现产业增收2200元以上。再次，加快了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为农业丰产丰收提供有力保障。最后，壮大了新产业新业态，为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奠定坚实基础。

二是重塑了新型城乡关系，优化了农村生产生活空间布局。首先，加强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第二产业为农业提供了包装、物流、仓储、通信等设备，推动了农村基础设施完善，使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其次，保护了农村生态环境。各地区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传统与现代融合，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培育生态环保产业，开发可再生能源，促进了生态环境保护。再次，弘扬了农村传统文化。农业与文化、旅游产业融合，传承了民族民俗文化、传统手工艺等非物质遗产，保护了传统村落与乡土文化。最后，促进了城乡融合。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和平等交换，推动了公共资源统筹，促进了城乡协调发展与共同繁荣。

三是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保障了农民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首先，带动了农民增收。农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提高了农产品附加值，给农民带来更高的经济回报。在克服严重自然灾害、农资价格上涨、新冠肺炎疫情散发等多种不利因素影响下，2021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8931元，实际增长9.7%。其次，提高了农民生活品质。随着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深化，城乡交流日渐频繁，农民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条件得到改善，消费观念逐渐变化。再次，提升了农民素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带动了优质教育资源下沉乡村，促进了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提高了农民的知识与技能。最后，加强了民生保障。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过程中，各地政府通过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保障了农民在城乡间可进可退，调动了农民发展积极性。

以“五链重构”促进产业深度融合，带动农村产业提质增效

发展农村产业，重点是要在纵向上打造农业的全产业链，推动产业向上下游延伸，在横向上推动农业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从而以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利益链、创新链的“五链协同”，挖掘农业的多种功能，彰显农村产业的多元价值，更好地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一是要纵深推动产业链延伸，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当前，我国农村产业融合仍处于初级水平，很多人片面地认为农村

产业融合就是农产品生产业、加工业和销售服务业的融合，缺少对农业具有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种功能的理解和认识，导致对农业多种功能的开发程度不高。因此，要在确保粮食安全和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基础上，促进农业产业链延伸，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其中，重点要促进产业链延长发展，推进产业功能拓展，从而带动产业调整升级，激发农村产业的内生发展动力。

二是要动态实现价值链提升，提升农村多元价值。当前，农村产业融合面临一产不强、二产不优、三产不活的多重困境，上下游之间的联结缺乏灵活性和动态性，造成农产品附加值较低、联农带农效果不佳等问题。应推进农业与旅游、文化、教育等多种产业的融合发展，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农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产业，发挥农村产业融合的“乘数效应”，提升农村的经济、生态、社会和文化价值。首先，以农产品加工业贯通产加销环节。引导市场主体做优品种、品质、品牌，构建高效集成的加工体系，打造区域共用品牌，提升品牌公信力。其次，以农村休闲旅游业融合农文旅产业。依托田园风光、村落建筑、乡土文化等优势资源，围绕多业态聚集、多场景应用，发展农事体验、研学科普、民宿康养等休闲农业新业态。最后，以农村电商对接科工贸产业。将现代信息技术引入农业生产营销的各个环节，并加快培育农村电子商务主体，引导电商、物流、商贸、金融、供销、邮

政、快递等市场主体到农村布局，培育农村电商实体及网络直播等业态。

三是要加快维护供应链稳定，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其他产业不同，农村产业大多地处偏远、物流成本昂贵。农村产业融合应打通供需链条，拓展销售渠道，降低流通成本，实现产销的有效对接。一方面，应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服务体系。首先，加强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打通农产品流通销售渠道提供保障。其次，推进产地仓储保鲜冷链基础设施建设，有效解决产品保鲜、存储难题，降低运输成本和过程损耗。最后，健全农村物流服务体系，建设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和集散配送站点，提升农产品商品化处理、品控分拣、打包配送、统配统送等综合服务能力，解决物流成本高、配送速度慢等问题。另一方面，应对接产销资源，搭建数字化销售渠道。首先，整合资源，探索形成集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于一体的订单化生产、批量化供应的农业供应链体系。其次，建设农业供应链信息平台，促使农产品市场信息精准对接，进一步拓宽农产品流通渠道。最后，强化标准化生产与质量控制，配备智能化设施设备和质量追溯设备，鼓励使用“一品一码”等追溯技术设备，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四是要协调完善利益链构建，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当前，农村产业融合的利益联结机制构建滞后，农户在获取发展资源、争取政策支持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构建有效的利益联

结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多元主体获得产业发展的红利。因此，要明确权责利和收益分配模式，形成优势互补、风险共担的发展格局，让各主体共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一方面，应构建多形式利益联结机制。通过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村集体和龙头企业签订农产品购销合同或开展股份合作等形式，构建订单农业、股份合作等利益联结机制，保持多元主体间稳定的合作关系，确保农户持续发展和获得稳定收入，并在此过程中提高农产品供应的规模化和组织化水平，增强农产品持续供给能力。另一方面，应明确多元主体的权利和责任，激发多元主体的活力。在多元主体的有效沟通与协调的基础上形成合力，构建齐抓共管、互动共建的利益联结机制，更好地引导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更有效地保障多元主体能够分享产业增值带来的收益。

五是要切实加强创新链支撑，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当前，仍然存在技术水平不高的问题，导致生产、加工、销售等一系列活动同外部技术、资源的融合互动不足。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夯实农业设施装备条件，可以为促进农业提质增效提供有力支撑。因此，要加强农业技术创新与推广工作，加速实现设备、工艺、产品等方面的升级，做到全程优质、全链提升，拓展农业提质增效的空间。一方面，应推进全链条技术创新和各环节产品创新，促进农业技术研发与农业生产、食品加工、生物材料等产业的融合

互动，推进物联网、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全产业链的应用，进一步提高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数字化水平。另一方面，应重视农业技术推广，深化农技推广体制改革，为农业技术推广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保障。

【实践新论·非凡十年】实现“双碳”目标 贵在统筹兼顾

2022-07-20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为推进“双碳”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党中央出台《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批准《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取得显著成效。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绿色低碳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型的复杂工程和长期任务。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坚定不移，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坚持稳中求进，逐步实现”，我们必须坚持统筹兼顾原则，系统推进“双碳”目标如期实现，进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全面绿色转型。

一、统筹兼顾“双碳”目标和发展目标

实现“双碳”目标不是只要应对气候变化、不要推动经济发展，而是既要应对气候变化，又要促进经济发展。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努力追求在“双碳”目标给定下的经济成本最小化。如果“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双碳”目标，其实很简单，只要停止化石能源的使用，回到农耕社会，但这显然是不现实、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因此，我们应始终去努力探索如何以最小成本与代价实现“双碳”目标。另一方面，努力追求在发展目标给定情况下的碳排放最小化。只要我们始终坚持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坚持绿色低碳化转型之路，就能够做到碳排放的最小化或者最优化。因此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最佳选择。

那么，如何实现兼顾？坚持低碳科技创新是重要路径。通过低碳科技创新，提高收益，降低成本，实现从高碳科技向低碳科技的转变，进而实现从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变及低质量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

二、统筹兼顾碳达峰目标和碳中和目标

“双碳”目标是“碳达峰”和“碳中和”两个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目标。

“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这意味着，大致上 2030 年实现碳达峰，如果有条件可以提前，但是实现这一目标是需要努力争取的。需要指出的是，发达国家大多已经实现碳达峰，它们属于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型过程

中的自然达峰。而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后期，消费耗能处于增长阶段，因此中国是在快速城镇化、工业化的同时，通过主动减排以实现碳达峰。这就意味着中国实现碳达峰，需要非凡的努力，需要付出更高的代价。这也正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

需要强调的是，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过渡期，发达国家普遍要用大约 50—70 年，中国安排自己的过渡期仅用 30 年。这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一个非常积极且有挑战的方案。

碳达峰的时间节点确定后，关键就是确定“峰值”。峰值定低了，近期发展压力加大，远期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就容易了；峰值定高了，近期发展压力相对较小，远期碳中和的目标实现难度就加大了。碳达峰的峰值确定后，关键就是确定“时间”。时间提前，近期难度加大，远期难度减小；时间延后，近期难度减小，远期难度加大。所以，国家层面要统筹确定碳达峰的峰值及达峰时间，区域层面要统筹确定各地的碳达峰时间及峰值，不能搞“一刀切”。

三、统筹兼顾碳减排和增碳汇

碳中和是人为排碳量与人为增汇量相等时的状态。碳排放量趋于零，即使没有碳汇增量，是碳中和；碳排放量减小到一定程度，被新增碳汇所吸收，也是碳中和。由于二氧化碳的边际减排成本曲线是以一条以递增的速度上升的曲线，

试图达到碳零排放的边际成本可能是极高的甚至是无穷大的。因此，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边界是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与碳汇边际增汇成本相等时，也即统筹碳减排和增碳汇就是寻找边际成本相等点。

碳中和必然是碳减排和增碳汇相向而行的过程。碳减排和增碳汇都是基于科技创新。一方面，是碳减排。一是通过能源结构优化和能源效率提升实现碳减排；二是通过产业结构优化转向高质量发展实现碳减排；三是通过消费结构优化从高碳消费转向低碳消费实现碳减排；四是通过科技创新从高碳技术转向低碳技术实现碳减排。另一方面，就是增碳汇。一是通过森林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农地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的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实现生态系统增汇；二是通过碳捕捉、碳封存、碳填埋、碳利用等工程技术手段实现工程系统增汇。

四、统筹兼顾改善能源结构和提高能源效率

碳排放总量的 80%以上来自于能源。我国化石能源又占能源碳排放的 85%左右。我国是煤炭大国，煤炭能源又占化石能源的 70%左右。由此可以说，碳减排的根本任务在于能源革命。

能源革命的第一个方向是推进能源结构优化，从化石能源转向非化石能源。要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潮汐能、氢能等，适当发展水能、核能等。能源革命的第二

个方向是推进能源效率提升。从我国自身纵向比较，我国的能源效率有了大幅度提升；从国际之间的横向比较，我国单位 GDP 的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1.5 倍。这个差距就是潜力，通过技术创新以更低的能耗带来更大产出，就是我们的目标。

总体来说，能源革命过程中上述两个方面的工作都要大力推进，但近期的目标应该重在提高能源效率，远期的目标重在优化能源结构。

五、统筹兼顾生态碳汇和工程碳汇

无论是生态碳汇还是工程碳汇，实现碳中和的功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增碳汇的成本是不同的。如果生态系统增汇的成本低于工程方法增汇，那就优先发展生态系统增汇产业；反之，则优先发展工程方法增汇事业。从目前的技术状况看，生态系统增汇成本相对更低，因此，短期内可以探索优先发展生态系统增汇技术和增汇产业；从长远来看，工程方法增汇具有无限潜力，因为技术进步具有无限的潜力。因此，片面强调生态系统碳汇或工程方法碳汇都是不妥的。正确的态度是统筹兼顾生态碳汇与工程碳汇，选择边际增汇成本相对低廉的碳汇增汇技术。

六、统筹兼顾碳减排和污染治理

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经历两三百年的时间，走的是一条“先污染，后治理”“先治污，后减碳”的路子，且碳达峰是自然达峰，是产业结构变化、能源结构变化、城市化完成、

人口减少而自然形成的达峰。而我国还处于工业化后期，污染治理的任务并未完成，减碳的目标又提上了议事日程。我国是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产品有效供给、实现“双碳”目标多重任务叠加的时期。

如何突破重围？根本方法就是统筹兼顾降碳、治污、扩绿。从经济学上讲，降碳、治污、扩绿等分别治理或分阶段治理的成本要高于统筹治理的成本，就好比建设一个化工厂，在有环境规制前提下，必须考虑环境代价，具体有两种模式：“分治模式”下先治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再治理二氧化碳；“统治模式”下就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二氧化碳等废气一并治理。“分治模式”需要分别上马污染物或温室气体处理设施，“统治模式”下可以共享某些设施，从而实现成本节约的目的。

因此，企业发展要努力谋求以环境目标为主的绿色发展、以资源目标为主的循环发展、以气候目标为主的低碳发展的统筹兼顾，以实现范围聚焦效果。

七、统筹兼顾低碳科技创新和低碳制度创新

无论是碳减排还是增碳汇，无论是优化能源结构还是提高能源效率，无论是产业结构的升级还是消费结构的优化，都离不开低碳科技创新。科技创新不到位，要么是“高碳而经济”，要么是“低碳不经济”；科技创新到位，才能实现从“低碳不经济”向“低碳且经济”的转变。

在技术状况给定的情况下，低碳制度创新也可以改变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选择。征收高碳碳税，可以遏制高碳产业的发展和高碳产品的消费；提供低碳补助，可以激励低碳产业的发展 and 低碳产品的消费；实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可以激励企业将稀缺的碳排放权配置到能够带来更高碳生产率的企业那里，从而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与此同时，低碳制度创新还可以通过激励低碳科技创新发挥作用。低碳补贴制度就可以激励企业低碳科技创新积极性，进而加快低碳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丰富市场的低碳产品，促进低碳消费形成时尚。

因此，要统筹兼顾低碳科技创新和低碳制度创新，使二者能够互促互进，同时要注重让低碳制度创新发挥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保障作用。

【实践新论·非凡十年】贯彻新发展理念， 走好新时代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2022-07-19

编者按：为进一步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凝聚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力量，在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的指导下，开设“实践新论·非凡十年”网上理论传播专栏，持续推出系列理论解读文章和新媒体产品，充分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系统总结十年来“中国之治”的伟大成就，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浓厚氛围。

作者：常庆欣（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对于发展理念的重大升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作为“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新发展理念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刻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

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彰显了党在团结带领人民群众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对经济发展目标、原则与评价标准的统一。站在“两个大局”的历史高度回答好经济形势应该怎么看、经济工作应该怎么抓等问题，可以从根本宗旨、问题导向和忧患意识三个方面对新发展理念加以把握。

从“根本宗旨”把握新发展理念，始终坚持把高质量发展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在提升发展质量中促进共同富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党和国家始终坚持把人民利益作为发展的核心导向，将人民视为“国之大者”，在现代化建设中注重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更加注重共同富裕问题”。从新发展理念诸要素指向来看，人民需求是“创新”发展的方向，其关键就是“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科技创新的落脚点，把惠民、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发展不“协调”是制约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障碍，因此推动产业结构之间、城乡区域之间、文明要素之间的协同发展，实际上就是强调人民在领域行业、空间格局、动力升级等方面对于美好生活

的诉求；“绿色”发展关注合乎人性的存在基础与生活要素，天蓝、山绿、水清、环境优美是人民生活的增长点，因此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美丽中国的实质就是要建设好具有生态文明底蕴的美好生活环境，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引领是中国经济“开放”发展的重要立足点，通过“一带一路”建设、金砖国家峰会、G20峰会等对外交往的重要平台，中国致力于“让增长和发展惠及所有国家和人民，让各国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日子都一天天好起来”，在不断为全人类创造美好生活的过程中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围绕美好生活需要多元性、多样化以及高质量、高品质化的特点，“共享”发展则强调进一步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在多层次、多领域、多环节充分落实好渐进共享、全面共享、高质量共享，让百姓有更多成就感和获得感。民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指南针”，因此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新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真实可感的现实行动。

从“问题导向”把握新发展理念，紧盯解决突出问题形成整体推进力量，切实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作为“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新发展理念是对新时代“什么是高质量发展”“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回答。一方面，新发

展理念与“五位一体”“四个全面”总体性联动，为破解社会主要矛盾提供指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顶层设计，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内容的新发展理念，围绕增强创新能力、推动平衡发展、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开放水平、促进共享发展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强调以发展的动力升级、布局优化、可持续性增强、形态升级与效益提高为发力点，在总体布局与战略布局的意义上为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提供了具体指引，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向着更高效率、更可持续方向发展。另一方面，针对经济发展领域的具体现实问题，新发展理念注重要素间的内在关联性，强调通过发挥诸要素的整体作用以形成更加精准务实的举措，不断破解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难题。例如，当前我国生产和生活体系向绿色低碳转型仍面临诸多压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任重道远。新发展理念诸要素作用于这一战略目标，强调在创新发展中推动低碳技术的升级，“以增强共性技术研发能力为目标”实现产业结构低碳化；在协调发展中加强地方间能源发展关系的谋划，形成高效协

同、互济互惠的低碳发展格局；在绿色发展中对生态环境保护资源有效利用整体增效进行系统规划布局，切实落实好“双碳”行动；在开放发展中继续打造绿色丝路使者计划等气候多边合作平台，提升全球范围的气候韧性；在共享发展中建立碳普惠的正向引导机制，调动社会公众积极加入全民减排行动。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因此，新发展理念着眼于系统把握新发展阶段的不同经济发展规律，指向高质量发展目标，从而切实解决好“发展起来以后”的新问题。

从“忧患意识”把握新发展理念，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立底线思维，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随时准备应对更加复杂困难的局面。”党和国家首次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并将其作为重点内容进行战略部署，强调要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努力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新发展理念是针对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复苏低迷形势提出的治本之策，是对国内经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国际经济运行下行风险较大这一科学研判基础上的积极回应。着眼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需要，新发展理念强调防范化解关键核心技术受限等经济安全风险、把握科学技术在经济安全体系

中的时代跃升机会，从而更加前瞻性地看待、处理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各种隐患问题；强调资本服务于提高供给结构的灵活性、服务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从而更好地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不断提高资本运行的治理能力；强调保障粮食、能源、重要资源的供给安全，全面强化供应保障能力和实施全面节约战略，从而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筑牢筑稳发展之基；强调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以构建双循环经济发展新格局为抓手，进一步构建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的产业链和供给链，从而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为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高质量发展的内容指向就是抓住发展与安全的“双轮驱动”，因此，新发展理念强调以发展促安全、以安全保发展，不断提高预先防范风险的意识、提升应对化解风险的能力，从而能够“增强我们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中，推动我国从“大国阶段”迈向“强国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许多重大理论和理念，其中新发展理念是最重要、最主要的。”走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需要进一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这就需要把新发展理念作为指挥棒、红绿灯，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从根本宗旨、问题导向和忧患意识的把握中进行统筹布局，

进而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不断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为新发展阶段凝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强大的前进定力。

【实践新论·非凡十年】教育与经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2022-07-15

21 世纪以来，世界各国之间在经济、贸易、教育、科技、政治、军事、外交等诸方面的竞争格外加剧。一国竞争力的基础在于教育和经济，因此，有人说 21 世纪是新“double-E”（即 Education 与 Economy）的时代。我国党和政府长期高度重视教育和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和经济发展迅速，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位居世界第一并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教育和经济更是取得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非凡成就，举世瞩目。可以说，这十年，教育与经济之间相互促进、关系协调、共同发展，共同迈上了“新台阶”，实现了“双超越”。

教育与经济比翼双飞、不断突破

这十年，我国教育和经济发展的均迈上了“新台阶”，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成就。这些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总体保持在 30% 左右，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 2019 年就首次超过 1 万

美元；与此同时，我们已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 2019 年就首次超过 50%，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高等教育强国的发展目标。

这十年，我国教育和经济的发展进入贡献凸显期。这十年（2012-2021 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人均国民收入总值（GNP）总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等都占改革开放四十四年（1978-2021 年）总成就的一半以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际 GDP 总量总计为 1446 万亿元（按 2020 年不变价格计算），其中这十年的合计为 852 万亿元，占比为 58.9%。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人民生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幸福，“钱包”鼓了，衣食住行更加富足便利。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来看，1978 年以来四十四年的总计为 107.8 万元（按 2020 年不变价格计算），其中这十年的合计为 60.9 万元，占比为 56.5%。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人们对教育的需求也显著增加，特别是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更加旺盛，我国高校扩招政策大幅度地提高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 1978-2021 年的四十四年里，我国普通本专科招生数量总计达到 15366 万人，其中这十年的合计为 8033 万人，占比为 52.3%；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总计达到 1313 万人，其中这十年的合计为 800 万人，占比为 60.9%。

这十年，我国教育和经济发展在全球中的地位实现“双超越”，均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对于人口规模在两千万以

上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人均水平想要赶上发达国家是十分艰难的。1978年以来，我国是人均GDP增长和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提高最快的人口大国之一。这十年，我国在全球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的排位中，双双超越世界平均水平，向更高的目标大步前进。2014年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超越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首次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达到41.3%，高出世界平均水平6.0个百分点。2021年，我国人均GDP也首次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达到12551美元，高出世界平均水平34美元。我国教育和经济发展实现“双超越”，进入了世界各国竞争的“上半区”，这是质的飞跃。

经济支持教育发展的贡献突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我国教育发展，把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切实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在党中央的强有力领导下，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成立了党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各级各类学校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基本实现全覆盖，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各项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教育事业中国特色更加鲜明，教育治理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新时代教育强国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这十年，我国教育经费投入的大幅度增加为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这也是强劲经济发展实力的重要体现。2012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首次超过2万亿元，

这是在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之后占 GDP 比例首超 4%，达到 4.3%，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座谈时所指出的：“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教育，2012 年以来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 4%，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此后这十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 GDP 的比例始终维持在 4% 以上，有力保障和推动了我国教育发展总体水平迈入世界中上行列，成就斐然，实属不易。在 1992-2021 年间的三十年里，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总计约为 51.1 万亿元（按 2020 年不变价格计算，2021 年的数据是估计值），其中这十年的合计为 35.2 万亿元左右，占比约为 68.8%，即这十年的合计是党的十八大之前二十年合计的两倍多。

这十年，我国经济创新驱动发展对教育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创新离不开创新人才，而创新人才培养主要责任在高校。为此，2015 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近年来一批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亮点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正逐步形成。教育部也表示，我国高等教育实力强起来了。

通过“211”“985”工程和“双一流”建设计划，一批大学和一大批学科已经跻身世界先进水平，中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进入世界第一方阵。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相应地，我国高等教育已由外延式发展阶段转向内涵式发展阶段。

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

这十年，我国教育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批的高学历人才资源，高校毕业生数量超过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毕业生总数的“半壁江山”。在1978-2021年的四十四年里，我国普通本专科毕业生规模总计达到12414万人，其中这十年的合计为7179万人，占比为57.8%；我国毕业研究生规模总计达到926万人，其中这十年的合计为598万人，占比为64.5%。

这十年，我国教育培养的人才质量显著提升，带动了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增幅占改革开放以来总增幅的一半以上。就业人员的人均GDP是衡量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指标。按照2020年不变价格计算，我国就业人员的人均GDP从1978年的6302元提高到2021年的147120元，总增幅为140819元，其中这十年的增幅为71706元，占比达到50.9%。（该数据由作者根据历年官方公布的就业相关数据计算得出）这十年，我国GDP保持中高速增长态势，而同期我国就业人员的绝对数量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出现“双

降”，主要原因在于劳动力质量的提升对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这十年，我国高校产生的科技创新成果显著增加，与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发展，对经济发展作出了直接贡献。据教育部公布的数字，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和创新第一动力的结合点，60%以上的国家科技三大奖励由高校获得，全国60%以上的基础研究、80%以上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由高校承担。各种重大科研成果的主产地集中在“双一流”建设高校身上，实现了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显著提升。近年来，清华大学的“面向人工通用智能的类脑天机芯片及类脑计算系统”、北京大学的“植入前胚胎发育机制与遗传学诊断新方法”、中国科技大学的“九章量子计算原型机”等高校所取得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为国家“卡脖子”技术领域的创新突破、创新型国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高等教育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能力明显且持续增强。

展望未来十年（2022-2032年），我国教育与经济都将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中稳步提高，取得更大的成就。未来十年，我国人均GDP非常有希望达到2万美元以上，踏进“入门发达国家”行列；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超过70%，进入到普及化发展的更高阶段；我国将更加接近教育强国和经济强国的发展目标，更加迫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

们要进一步充分利用制度优势，凝心聚力，团结一致，改革创新，协调好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建立更加完善的教育体系，持续增加教育经费投入，进一步促进资源配置均衡和教育公平，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益，强力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以教育强国助推经济强国建设。

【实践新论·非凡十年】破解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梗阻，奠定高质量发展雄厚基础

2022-07-08

国家强，经济体系必须强。在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现代化作为其先导与动力，为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其他领域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经济基础、物质保障与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迫切要求”，并从七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既是一个系统的现实工程，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有利于在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廓清重点、突破梗阻、有效施策。

（一）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构建创新引领、协同发展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当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位居世界第一，形成了全球门类最齐全的工业体系。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与新特征叠加全球经贸形势的新变化与新挑战，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在于“以我为主”地实现经济循环流转和产业关联畅通，矛盾的核心在于产业层面供给侧的结构性失衡。这其中，生产体系创新能力的不足和产业结构的失衡是背后深层次原因。

针对以上问题，第一，要明确技术创新是有效解决结构性失衡的核心手段，要以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为目标，在供给端进一步鼓励现代产业特别是人工智能、现代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高精尖行业的发展，持续推行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融合协调的产业政策，充分激发各部门自主创新积极性，强化传统和新兴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有力支撑新旧动能转换，熨平经济波动性。第二，坚持深化改革，积极破除阻碍资源要素流动和配置的制度梗阻和区域壁垒，建立健全要素市场的运行和调节机制，降低企业交易成本，畅通各产业的生产供应体系；要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激活技术创新生态系统，优化创新鼓励政策，突出激励自主创新，提高创新质量，同时改革专利审批制度，激发企业对以发明专利为主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和颠覆式原始创新的重视和实现。第三，注重实施产业空间区域发展的动态平衡战略。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经济发展区的综合承载能力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破除资源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依托各地的禀赋优势，形成纵向有序的产业链条，强化中心城市对周边区域发展的带动能力，打造新的创新增

长极，使之成为新发展格局下联接国内、国际循环的重要平台和关键点，并最终实现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全面现代化。

（二）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规则要求。近年来，随着我国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提高，强大的内需市场初具规模，构建统一大市场向好发展。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实现井喷式增长，2020 年达到 39.2 万亿元。数字经济一方面打破了传统经济发展的空间束缚，加速了国内大市场的统一，但另一方面也使得技术、资源和数据等市场要素向“头部平台”集中，新兴的垄断方式、完全的价格歧视以及资本的无序扩张成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主要梗阻。

面对新业态、新模式催生的新问题，一是要从制度入手，强化政策引导，坚持反垄断政策的有效实施，设置政策“红绿灯”，在建立健全市场准入制度的同时，规范市场公平，合理管控资本在市场中的流动和分配。二是要加强监管力度，充分利用数字经济的先天性优势打造“政府-市场”互动平台，强化制度和政策的宣传工作，提高企业公平竞争意识。三是要完善反“平台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体制机制，充实反垄

断的监管理论，建立全方位、网络化、串并联共同布局的市场监管体系，实现市场中的全链条、全领域监管。

（三）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

收入分配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激励机制。提高收入分配制度科学性和合理性的关键在于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近年来，我国整体上收入分配呈现出向好态势，但也要承认，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体系仍存在问题：初次分配中，生产端处于技术加速积累、数字化转型阶段，须保证技术型人才的报酬逐步提高以提供创新激励，从而带来劳动者内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为实现共同富裕带来挑战；再分配中，目前财税政策在整体上对收入分配调节效果相对不足，为实现共同富裕加重了难度；三次分配上，目前短期内尚未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三次分配规模和效果还较小，难以为共同富裕提供坚实保障。同时，近些年来呈现出代际流动性下降的趋势，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逐步集中化，在长期上将影响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

对此，必须要坚定生产的决定性地位，加快技术转型，实现关键领域关键技术自主化，保障经济发展效率，为共同富裕提供底层动力支撑。短期内，改善我国的再分配政策，调节调整税制结构，逐步增加财产税、遗产税、资本收入税等税种，打破医疗、社保的区域、城乡壁垒，为中低收入人群的共同富裕“兜底”；长期上，提高人均教育投资额，优

化教育资源结构，将我国人口红利逐步转变成为人才红利，提倡三次分配，营造携手共进的社会氛围，促进财富的横向内部转移，从而在代际间实现纵向公平，为共同富裕提供长期保障。

（四）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

建设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优势互补性持续增强。这十年来，我国城镇棚户区改造惠及 9000 多万居民，老旧小区改造惠及 2000 多万户，1.8 亿左右的农村人口进城成为城镇的常住人口，我国的城镇化率由 53.1% 上升到了 64.7%，城乡和区域收入差距都在逐步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扎实推进。但我国城乡区域发展体系仍存在如下问题：宏观层面的人口老龄化与总规模下降冲击；中观层面的趋势收敛协调发展的动力不足困境；微观层面的多尺度空间单元发展路径雷同安全保障不周制约等。

由此，要坚持“厘清功能定位、明晰特色优势、把准方向航道”思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寻获应对策略：一是要尊重多尺度空间互动发展的基本规律，建立多种类、多功能、多目标的空间单元发展体系，厘清县域、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等空间单元在农业保供、能源保稳、边疆保安、生态向好、科技向上、经济向前的差异化功能定位。二是要确立“定

位+优势”与“功能+特色”的发展动力指南，明晰各空间单元在不同尺度下的定位及其优势，立足自身特色，发挥不同面向的功能，组成特色化功能集成体系，支撑空间单元互动协调。三是要尽早规划面向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规模达峰后的总体战略，前瞻性研判人口规模的变动时间表、人口集散的流动趋势与年龄结构的代际影响，做好相应的重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保障举措与长远战略规划的衔接匹配。

（五）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

建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和建设美丽中国的迫切需求和重大任务，对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时代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状况实现了历史性转折，植树造林占全球人工造林的 1/4 左右，单位 GDP 的碳排放量累计下降 34%，风电、光伏发电等绿色电力的装机容量和新能源汽车产销量都居世界第一。当然不容忽视的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面临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取向的进度约束、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的现实诉求与存量污染大生态欠账多的历史包袱等三重挑战。现代化的绿色发展体系，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条件，旨在调整解决生产力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和谐关系问题，根本遵循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因此，一是尽快完善实现“双碳”目标的“1+N”政策体系，全面分析和综合研判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对社会经济的全方位影响，坚持两个阶段两种策略，兼顾地区生态不平衡性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把长期战略处理为周期化策略，稳扎稳打推进。二是以产业绿色化为核心推进生产活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在发展中破解发展难题，一方面以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为依托，激发新兴产业增长，降低产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三次产业的绿色化、信息化和数智化转型，降低其对环境的不利影响。三是保护与修复并重推进，“历史欠账”步步还清，不搞一蹴而就、超越阶段、大干快上的运动式生态保护与环境修复，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形式多样、绩效导向的多元化、市场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另一方面要尽快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引导个人、企业、社会等多方力量积极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中来，为绿色发展奠定扎实基础。

（六）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

打造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进入深刻调整期叠加我国经济增长动能结构性转变下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扎实推进的进程中，我国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全球价值链位势稳步提升，无论是全球经济还是一带一路沿线都逐渐形成了以我国为枢纽的全球价值“双环流”体系。然

而，不得不引起重视的是，我国虽然在进出口贸易上保持着强大的规模优势，但近年来进出口贸易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日趋减弱。与此同时，过往简易加工出口模式下导致的我国产业分工链条过于依赖国际需求，也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当前本土产业链的创新升级过程，为新时代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发展带来了重大风险。

面临如上制约，新时代下要打造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全面开放体系下的重要战略抓手，坚持推进对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同时开放的高水平全方位开放，推动沿海和内陆地区对全球市场的联动开放，以不断深化的开放促进我国经济领域的进一步改革。第二，坚持更高水平的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全面开放，注重引进外资的质量，全面推广负面清单管理和准入前国民待遇制度，应继续坚持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重点推进医疗、教育、金融等服务业领域的有序开放，同时也积极鼓励国内优秀的本土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在国际竞争中不断提升自身能力，形成全面开放体系下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和新优势。第三，在开放的同时，要坚持安全高效的基本原则，要注重新时代我国产业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升级，打造以创新引领的价值链革新，积极培育全面开放体系下的新业态和新动力。同时，在产业发展上，既要坚持内外资企业一视同

仁的政策原则，又要积极施行国际通行的安全审查和反垄断手段，维护市场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公平竞争，构建全面开放体系下有序的市场环境。

（七）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

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经济发展长盛不衰的研究命题，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变迁取得了重大成就，不仅逐步确立并坚持了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而且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融合与创新，使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目前，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面临的主要梗阻在于，市场与政府的边界仍然不够清晰，现代产权制度仍待健全，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也需重新审视。

针对这些梗阻，一是要强调市场的调节作用，在数字经济全面渗透到各行各业的背景下，导致“市场失灵”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高度缓解，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变得更加有效，因此要持续坚持市场化、法制化原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二是要突出政府的引导能力，积极引导市场竞争公平，完善保护产权的制度体系，充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三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在鼓

励“专精特新”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保证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良性互动和国有经济在关键领域的核心地位，利用国有企业与政府联系紧密的天然优势，充分调动国有企业创新积极性，特别是要引导国有企业对具有强知识溢出效应的基础性、颠覆式原始创新的投入和研发，强化国有企业在国家创新系统中的领头羊地位。

【实践新论·非凡十年】不忘初心，让人民过上美好的幸福生活

2022-07-06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的庄严承诺，是一个政党对人民的使命担当。回首十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为的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不同时空不同表述，饱含的却是一样的爱民情怀。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基因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所在、使命所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车轮驶入快车道，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日俱增。目前，我们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卫生体系，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不断提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扎实推进，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互补性增强；

城镇棚户区改造 3961 万套，惠及 9000 多万居民；老旧小区改造惠及 2000 多万户，住房条件改善；1.8 亿左右的农村人口进城成为城镇的常住人口。

为了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用好财政税收制度推动全国均衡发展。10 年来，全国一般公共预算科学技术支出累计 7.1 万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超过 29 万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累计 23.11 万亿元；加大民生支持力度，财政转移支付向基层倾斜，向不发达地区倾斜。

我国政府教育支出从 2012 年的 2.12 万亿元，增加到 2021 年的 3.82 万亿元。这种增长不是“撒胡椒面”，而是在扩大支出的同时推进基本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村地区、边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脱贫地区教育水平历史性提高，区域城乡校际差距缩小，义务教育普及程度甚至超过了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学率提升至 88.1%，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 10.9 年。

政府卫生健康支出从 2012 年的 8058 亿元，增加到 2021 年的 18659 亿元。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全面加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大幅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提质增效，多层次医疗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国家和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推向全国，超过 85% 的县级医院具备二级医院服务能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增强。

政府社保就业支出从2012年的1.26万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3.44万亿元。城镇新增就业年均超过1300万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5万元,比2012年增长近80%。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2.5:1。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超过4亿人。养老金全国统筹迈出新步伐,养老保障体系覆盖人口全球第一: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由7.9亿增加到10.3亿,发放标准稳步提高;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由5.4亿增加到13.6亿,报销比例持续增加,居民医保的人均财政补助标准由240元提高到610元,惠及10亿城乡居民。人民生活进入相对殷实富足阶段。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做大做好“蛋糕”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稳定的工作、满意的收入,都仰赖一个平稳健康发展的经济。10年来,我国经济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114万亿元,占全球经济的比重由2012年11.4%上升到18%以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5万美元,正在冲击高收入国家门槛。这个成绩来之不易。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党运筹帷幄,把握国内外大势,适时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不断在危机中寻求主动。

综合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宏观调控不断完善。积极的财政政策，适时适度预调微调，有效降低经济周期波动影响，支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精准实施减税降费，2013—2021 年，减轻企业负担超 8.8 万亿元。科学安排政府债务规模，2015—2021 年，安排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 12.2 万亿元，支持扩大有效投资。10 年来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持续激发，全国新办涉税市场主体累计达 9315 万户。

稳健货币政策灵活适度，支持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稳定。一是前瞻性降准，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二是引导贷款市场利率在比较低的水平上进一步下降，降低市场主体的融资成本，激发融资需求。三是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设立 2000 亿元的科技创新再贷款、400 亿元的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同时对绿色、小微等薄弱环节精准支持。四是出台加强金融服务、加大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的 23 条政策措施，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科技发展成为支撑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的第一动力。2021 年，全社会的研发费用是 2012 年的 2.7 倍，基础研究费用是 2012 年的 3.4 倍。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 10 年上升 22 位。多款新冠疫苗、检测试剂和治疗药物有力支撑了新冠疫情防控。疫情能防住，经济能稳住，科技进步功不可没。

10 年来，立足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社会主义统一大市场，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有序运转，产业链供应链在疫情中接受考验；每个人都可以让自己的资源全国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完善分配制度改革，切好蛋糕共享发展成果

既要发展生产做大“蛋糕”，又要调整分配切好“蛋糕”。为此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依靠共同奋斗过上更美好的幸福生活，反对福利主义，不搞劫富济贫。第一，千方百计提高百姓工资等收入。把经济增长主要建立在劳动报酬提高驱动的内需上，而不是出口或者随着量的增加边际效益递减的投资；对投资依赖过多，会提高债务负担，带来现实或潜在的债务和经济风险。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第二，以要素市场化改革，推动百姓多渠道增加收入。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推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改革。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在促进生产要素最优配置的过程中，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

第三，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最大程度实现社保基金的互助共济功能。保障是兜底的收入；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运用各种政策“调高补低”，共享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富裕。

二是用税收政策支持百姓过上幸福日子。持续加大对小微企业税收支持力度，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起征点连续提高到 15 万元，连续多次降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享受门槛，延续实施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支持政策，降低市场主体负担，促进稳岗就业。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上亿自然人纳税人税收负担明显减轻，综合所得年收入 10 万元以下的自然人纳税人，大部分不用再缴纳个人所得税。不仅支持经济健康发展，还直接减轻个人税收负担，增加群众可支配收入。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没有开放，就没有进步，改革与开放相辅相成。这 10 年，我国倡议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动成立新开发银行，促进“一带一路”倡议走深走实。今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实施，意味着全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的自贸区正式落地。中国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

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我国税收协定网络覆盖 112 个国家和地区。发起建立首个税收领域多边国际税收平台——“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自主将关税总水平从 2010 年的 9.8% 大幅降至 7.4%，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2012 年以来，我们对外签署 9 个新的自贸协定，包括和瑞士、韩国、澳大利亚等，大部分商定的关税为零的商品比例达到 90% 以上。2012 年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 4.4 万亿美元，居全球第二；2021 年增至 6.9 万亿美元，连续两年全球第一。

一场世纪疫情把世界各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战胜病毒。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进国际抗疫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和挑战。中国愿与世界各国加强互利合作，共赢多赢。如果说全国统一大市场可以让要素在全国配置，全球合作则可以在更大范围促进要素最优配置。人民群众可以在更宽广的空间欣赏各种文明，享受不同国家的产品和服务。

世界风云多变，让人民过上幸福日子的初心不改。下一步，我们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在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

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加大对薄弱环节、重点地区、困难群众的倾斜力度，努力让全体人民在高质量发展中享有更高品质的生活，促进人民生活幸福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一方面，千方百计增加百姓收入，只有收入增加了，才能提高消费；另一方面，要从人民群众普遍关注、反映强烈、反复出现的问题出发，拿出更多改革创新举措，把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养老、食品安全、生态环境、社会治安等问题一个一个解决好，让百姓敢消费。政府、企业、居民各得其所，经济发展循环顺畅，社会运转安定和谐，中国经济才会一步一步迈上新的台阶。

【实践新论·非凡十年】推进减污降碳协同 增效，助力低碳美丽中国建设

2022-06-29

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重要讲话中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庄重承诺。这一基于科学论证，并从我国实际国情出发所提出的中长期发展战略指引，反映出了我国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双碳”目标，是我国着力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

“十四五”时期，我国已进入了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阶段，这是中国全面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关键五年，也是助力我国实现 2030 年碳达峰和 2060 年碳中和的窗口期和深水期。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已成为取得环境治理效益与气候减缓效益双赢，继而推动全社会绿色可持续转型和低碳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协同是基础

大气污染物同二氧化碳具有高度的同根同源性。据 2020 年生态环境部、国家统计局、农业农村部联合发布《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2017 年我国全年各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为二氧化硫 696.32 万吨，氮氧化物 1785.22 万吨，颗粒物 1684.05 万吨，部分行业和领域挥发性有机物 1017.45 万吨。从具体的污染物排放源和产生过程来看，工业源各类污染物排放占比均为最高，污染物主要源于涉及能源燃烧的加热、冶炼、锻造等工艺过程，以及涉及煤炭、天然气等燃料燃烧的火力发电过程；移动源所产生的大气污染物源于交通运输工具在运行过程中所利用的汽油、柴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燃烧；生活源所产生的大气污染物则主要来源于炊事、供暖等活动中煤炭、油品以及天然气燃烧。由此可见，人类活动所引起的能源生产和消费过程是大气污染物的主要排放来源。能源生产消费过程同样也是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加之大气污染物排放同温室气体排放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都存在着较高的同质性，大气污染治理同温室气体治理在协同管控思路设计、协同管控方法选择、协同管控方案制定以及协同管控效应评估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因此，要在深刻理解协同学理论内涵基础上，精准把握“减污”同“降碳”两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合作、相互影响、

相互制约的关系，以实现两个子系统的目标协同、区域协同、路径协同以及政策协同。

其中，目标协同，是要将降低污染物排放量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目标相融合，实现“双碳”目标和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有机统一；区域协同，是要通过排污权交易、碳排放权交易等手段，加强区域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联防联控，根据排放强度和总量进行分区统筹管理；路径协同，是要将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减排的金融路径、产业路径、生态路径相协调，研判产业转移、产业能源结构调整、用地规模变化、国土空间绿化等综合情景下协同减排效应；政策协同，则是要关注政策的连贯性和有效性，打通污染治理和温室气体排放治理的管控壁垒，建立起完善的减污降碳协同体制机制。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增效是关键

协同效应发挥得好，可强化内部各子系统的功能，更好地发挥系统的整体功能性。但与此同时，如何耦合“减污”和“降碳”两大主要生态环境治理策略，从而产生“ $1+1>2$ ”的效果，值得进一步思考。

首先应加强顶层设计，做好减污降碳机制建设。将温室气体作为一种约束性排放物逐渐纳入现有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中，实现减污和降碳协同的有法可依；制订和完善涉及碳排放的相关指南，规范指导碳排放监测、评估、核算、核查等工作，并同现有的空气质量标准、绿色产品与清洁生

产技术标准、化石燃料开采与消费标准相融合，形成温室气体排放管控标准体系；强化污染物排放和碳排放的联合监督执法，并将碳排放管控任务纳入到环境保护督察工作中，形成减污降碳相关政绩考核标准，督促各级部门加强污染物和碳排放的协同管控。

第二要紧紧牵住“能源消费管控”牛鼻子，加强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发展绿色可再生能源，提高非化石能源使用比例，合理控制传统化石燃料用量，特别是煤炭使用比例，推动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优化产业结构，推进清洁生产，发展绿色制造业，重点关注电力、钢铁、水泥、煤化工等高耗能产业生产工艺和流程革新，推进传统工业部门向低碳化生产转型，提高单位能源产出率；调整交通运输方式和结构，提升交通运输工具能效，推动运输工具电气化进程，逐步淘汰“黄标车”等高耗能运输工具，货运方面全面提升铁路和航运等多式联运效率，客运方面加大公共交通和共享交通投入比例，加快港口、空港等区域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合理利用风能、潮汐能等清洁能源；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构建绿色低碳社区，通过引导居民选择绿色出行、降低一次性制品使用等方式等减少生活能源间接消耗量，形成全社会低碳绿色循环发展新风尚。

第三要加强国土绿化空间规划管理，形成减污降碳生态方案。生态系统通过植物光合作用、呼吸作用、蒸腾作用以

及土壤、湖泊等环境介质呼吸作用、沉积作用等共同作用，在碳循环和污染物沉降中扮演重要角色。要针对已有自然生态系统进行生态环境工程修复，从而起到降低大气污染物土壤沉积风险、提高生态系统生产力，提升碳固存量等作用，这其中包括林地、草地恢复与保育工程，自然湿地修复与人工湿地设计，生态河道建设与污染湖泊治理等。同时，通过对当前生态用地格局进行合理调整，推动生态系统的功能性优化，实现区域环境容量和碳汇提升，主要包括土地利用类型转变、空间结构配置优化，土地高生产力植物、作物培育，农垦种植模式调整等。通过科学的管制措施将生态系统自然恢复力以及碳汇量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包括林地轮伐和补种，林地草地病虫害、水蚀风蚀防治，森林草地防火等措施。

第四要定期评估减污降碳成效，合理规划调整减污降碳协同路线。参照《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等技术性指导文件要求，结合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产生机理和排放特征，进行排放源分类和排放边界界定；在综合考虑历史排放特征，以及分析人口数量、经济规模、能源消费结构和强度等因素对于污染物和碳排放影响的基础上，设定不同发展情景对未来排放趋势进行模拟。应用系统学原理和协同学理论，对污染物减排和温室气体减排的相关性和耦合性进行预测，并同污染物或温室气体单一减排路径下排放量进行横向对比以分析协同

成效。根据协同成效分析结果，明确污染物减排和温室气体减排所组成的协同系统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单核带动机制和双核驱动机制，为制定中长期减污降碳协同路线提供依据。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十四五”的新起点，在应对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安全、提升环境质量、推动绿色转型、实现永续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下，更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锚定减污降碳协同发展目标，系统总结生态环境领域和产业能源领域所发生的深刻变革和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坚定信心，凝心聚力，向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实践新论·非凡十年】以更高水平开放推动民族伟大复兴

2022-06-24

纵观人类发展历史，“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史中，开放的时代，是繁盛的时代、快速发展的时代；封闭的时期，则是落后的时期、发展迟缓的时期。汉唐盛世，因开放而更加繁荣。清末时期，则因闭关锁国而沦为列强瓜分的鱼肉。直至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后，我国走出了一条以开放促改革发展的成功道路，创造出长期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中华民族再次以昂扬姿态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更高水平开放成为新时代的鲜明标识

开放之所以能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在于开放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开放可以改变资本、劳动力的投入规模，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升级，促进改革和经济制度变迁，为经济发展注入不竭动力。进入新时代以来，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脚步不会停滞！中

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脚步不会停滞！”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统筹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明确了开放要求、开放目标、开放布局等等，鲜明宣示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融入世界、拥抱世界、贡献世界。由此，更高水平开放成为新时代的鲜明标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推动力量。

更高水平开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社会化大生产为自己的物质基础，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相对狭小的国内市场无法容纳庞大的生产力，要求突破国内市场的边界，社会分工发展为国际分工，社会生产发展为国际投资和国际生产，国内贸易发展为国际贸易，经济全球化成为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必须扩大对外开放，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积极参加经济全球化。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必然要冲破地区和国家之间的限制，把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市场连成一体，在全球市场配置资源。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就要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优化全球资源配置效率，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同时，我国经济体制还不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需要自我完善，全面深化改革任务

仍然艰巨，就更加需要在更高水平开放中，借鉴别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成熟经验，对标先进的国际经贸规则，输入改革的外部动力，冲破内部的改革阻力，形成开放与改革的良性互动。

更高水平开放是新发展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高质量发展不再简单依赖要素资源投入扩张拉动经济增长，而是主要依靠培育新的经济竞争优势，提升全要素效率，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只有全面提高开放水平，使要素低廉的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世界制造业中心向世界创造中心转变，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吸收外资大国向对外投资大国转变，全球经济治理的参加者向重要贡献者转变，在更高水平开放中促进改革，为广泛利用世界市场和全球优质要素资源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外部条件，才能更好地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此，就要“继续推进对外开放，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

更高水平开放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要求。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中，营造优良营商环境，吸引全球优质要素资源为我所用，才能快速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更好实现创新发展；在更高水平开放中，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使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和沿边地区从开放的末梢变为

开放的前沿，以开放促进中西部更快发展，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均衡协调发展；在更高水平开放中，引进气候友好型技术，吸收符合环境保护标准的优质外商投资，发展绿色贸易，加强环境治理国际合作，借鉴先进国家发展绿色经济的经验，有助于实现绿色发展；在更高水平开放中，扩大外资准入范围，引导优质外资进入公共服务领域，有助于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共享发展。

更高水平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只有更高水平开放，才能在建立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更快打通生产关系各环节的堵点；只有更高水平开放，才能释放国内大市场的优势，强化与世界经济的联系，避免脱离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稳定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建立安全可控的供应链体系；只有更高水平开放，加强国内外经济技术合作，才能更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突破“卡脖子”技术，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

更高水平开放是应对世界经济大变局的正确抉择。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重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引发全球创新竞争更加激烈，全球经济结构面临重构，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深刻变革，给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带来广泛深

远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崛起，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多极化态势明显。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不能适应世界的变化，正面临着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改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与此同时，一些国家出现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贸易摩擦冲突上升，国际经贸规则趋于碎片化，多边经济贸易体制面临严峻挑战。新冠疫情爆发和反复，严重冲击了全球经济的稳定性，而各国应对疫情政策的非同步性、经济复苏的非同期性和非均衡性，暴露出世界经济的脆弱性。俄乌冲突爆发，加剧了世界的分化，导致全球部分供应链断裂，石油、天然气、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高企，给脆弱复苏的世界经济蒙上新的阴影。在世界大变局中，我国既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空前的挑战。实行更高水平开放，既是支持经济全球化、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实际行动，能够为世界经济恢复发展注入信心和动力；也是营造友好外部环境，应对世界大变局的挑战，把握机遇，推动我国经济稳健成长，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抉择。

以制度型开放和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引领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

瞩目新征程，我国将在更高水平开放的道路上砥砺前行，以更高水平开放推动民族复兴伟业。对内以制度性开放为核

心，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对外积极参加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经济全球化惠及更广大国家。

推动制度性开放，就要研判国际经贸规则变迁的趋势，对标先进的国际经贸规则，不断推进边境规则的自由化、便利化，以“边境后措施”为重点，构建“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的开放制度。升级区域开放平台，以自贸港、自贸试验区等区域平台引领制度创新，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规范补贴行为，打造非歧视的规制体系；推进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全面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和公正监管制度，建立竞争中性规制体系；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完善政府决策信息的披露制度，营造透明公开的治理环境；塑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形成要素流动自由、投资经营便利、服务优质高效的体制机制。

在制度性开放中，尤其要妥善处理好开放与安全的关系，完善风险防范机制。一方面，确立开放的安全观，只有坚持更高水平开放才能更好实现国家安全，只有掌握开放主动权才能保障国家安全，只有积极参加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才能维护国家安全。另一方面，确立积极的安全观，只有防范风险前置才能有效控制开放风险，只有建立完善的风险防范机制才能有效应对风险。因此，我们必须立足国情、着眼长远，坚持独立自主与扩大开放有机结合，按照先试点后推广的原则，根据国内承受能力推出开放举措，增强粮食、能源、资

源等的自给能力，守住经济安全底线，发挥制度优势，实行重大科技联合攻关，提升关键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高科技产品自主开发能力，提升国内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在此基础上，对外我们要更加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倡导“以规则为基础、共同发展为导向”的新型全球化，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具体实践中，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推动高水平“一带一路”建设，增加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帮助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提升参与国际贸易的能力，缓解经济全球化中国家间利益不平衡的矛盾。积极参加区域经济合作，构筑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支持全球经济治理体制机制改革，积极参与新兴领域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制定，促进建立互利共赢、公开透明的数字经济国际规则，推进绿色发展、产业链供应链等新议题谈判，推动构建投资便利化多边框架，维护多边治理体系的有效运转，使经济全球化造福世界。

【实践新论·非凡十年】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标杆和高质量发展示范者

2022-06-21

建设自贸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从建设自贸试验区，到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目前，全国已设立 21 个自贸试验区及海南自贸港，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的试点格局。为全面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自贸区（港），各地主动扛起“为国家试制度、为地方谋发展”的使命担当，开放新高地“多点开花”，改革试验田“遍地结果”。这些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正逐步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示范者和引领者，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及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正能量。

我国自贸试验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率先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制度体系，打造对外开放前沿阵地，既源于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带来的外部压力，也源于国内外经济竞争形势转变引起的内在需求。一方面，2008 年金融危机后，全球

经济治理平台出现了多边贸易体制停滞、区域合作进程加快的趋势，规则一致、竞争中立、知识产权、环境和劳工标准等为代表的边界后措施成为区域或国家间贸易谈判的主流。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也迫切需要新一轮高水平开放来倒逼国内改革的推进。自贸试验区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肩负起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的重任，探索新途径，闯出新路子，在推动我国对外开放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是前瞻性、差别化、可推广性改革探索不断深化。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核心任务是制度创新，鼓励各地根据各自禀赋特色，开展差别化改革探索。2016 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力争取得更多可复制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进一步彰显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试验田作用”。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2018 年 11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创新若干措施的通知》，推出了 53 项改革措施，加大赋权力度。截至目前，我国自贸试验区已累计在国家层面推出 278 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地方层面推广了约 1400 项制度创新成果，对照各自总体方案，各地改革试点任务实施率普遍超过 85%。278 项国家层面制度创新成果中，涉及领投

资管理领域 76 项，贸易便利化领域 76 项，金融开放创新领域 30 项，事中事后监管 60 项，服务业(人力资源领域)18 项。其中，既有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等基础性、引领性的制度变革，也有“海关通关一体化”等监管模式创新，还有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四个一”等全流程制度优化，这些制度创新成果经过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为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积累了有益经验。

二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开放新格局加快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沿海开放到内陆开放，各地自贸试验区不断推进制度型开放举措，引领带动全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自贸试验区建设 9 年以来，外资负面清单不断缩减，出台了 8 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由最开始的 190 条特别管理措施，缩减到了 2022 年的 27 条，尤其是自贸区版负面清单实现了制造业条目清零，可以认为制造业方面自贸区已经做到了全面对外开放。虽然我国服务业整体开放水平相对不高，但自贸试验区近年来在科技、互联网信息、金融、教育、文化旅游、医疗养老、专业服务等服务重点领域加快开放。例如，海南自贸港作为我国主动开放的重要平台，2021 年推出全国首张跨境服贸负面清单，《海南跨境服贸负面清单》在 120 个左右的分部门，开放水平都超过了 WTO 的承诺，绝大多数甚至超过 RCEP。同时，

自贸试验区借助金融开放前沿阵地的优势，FT 账户（即自由贸易账户）在资本自由流入流出和自由兑换方面率先突破，有效防范金融开放风险的监管政策和促进双向开放的举措，为我国全方位开放创造良好环境。在对外开放新格局方面，沿边自贸区通过寻找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互补优势，探索跨境贸易、跨境物流、双向投资，而内陆自贸区依托航空、铁路等综合交通和物流枢纽，构筑内陆开放新高地，更好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三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涌现。制度创新赋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化模式创新和业态创新，为自贸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创新动力。2018 年 10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广东自贸试验区珠海横琴新区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时强调，横琴有粤澳合作的先天优势，要加强政策扶持，丰富合作内涵，拓展合作空间，发展新兴产业。2020 年 11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要发展更高能级的总部经济，统筹发展在岸业务和离岸业务，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重要枢纽。在数字经济、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海洋经济等新经济领域，各自贸试验区正以更大力度拓展新兴产业增长空间，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在跨境电商、离岸贸易、保税维修、海外仓等外贸新业态方面，自贸区加快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创新，

探索建立适应和引领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国际规则，为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能。在全产业链发展方面，浙江自贸试验区推进以油气全产业链为核心的大宗商品投资贸易便利化自由化，天津自贸试验区打造航空航天全生命周期产业链，江苏自贸试验区探索生物医药全产业链开放创新，等等，为我国产业链安全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四是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曾比喻说，“投资环境就像空气，空气清新才能吸引更多外资”，强调“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重要目标就是要通过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进程中，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逐步推进政府、市场、要素环境深层次变革，在产业协同创新和系统生态培育中发挥支撑引领作用。在贸易便利化领域，通过完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丰富口岸功能、推进海关监管制度创新，自贸区贸易便利化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在投资便利化领域，自贸区率先深化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全面推进商事登记便利化，并在全国率先试点“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破解企业“办照容易办证难”“准入不准营”等突出问题，释放企业创新创业活力。2021年21个自贸试验区利用外资增长19%，比

全国高 4.1 个百分点，以不到全国千分之四的国土面积，实现了占全国 18.5% 的外商投资，外贸进出口增长 29.5%，比全国高 8.1 个百分点，占全国进出口比重的 17.3%，自贸试验区正以优越的营商环境成为名副其实的对外开放高地。

【学习时刻 | 金句】爱护、期待青年，为创造历史荣耀和时代辉煌积蓄磅礴力量

2022-05-17

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一个民族只有寄望青春、永葆青春，才能兴旺发达”，并强调“青年之于党和国家而言，最值得爱护、最值得期待”。一百年来，一代又一代青年坚定信念、紧跟党走，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贡献力量，谱写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激昂的青春乐章。在新的征程上，如何更好把青年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动员起来，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是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和青年工作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青年和青年工作，致力于领导青年、爱护青年、激励青年，不断为青年的成长和发展注入时代能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蓄起了磅礴的青春力量。

一、青年是党和国家始终珍视的瑰宝

1916年，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李大钊撰写了享誉历史的《青春》名篇，热情地欢呼和赞颂青年，热切地期盼青春力量和青春精神。他指出：“青年锐进之子，尘尘刹刹，立于旋转簸扬循环无端之大洪流中，宜有江流不转之精神，屹然独立之气魄，冲荡其潮流，抵拒其势力……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涯，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此之精神，即生死肉骨、回天再造之精神也。此之气魄，即慷慨悲壮、拔山盖世之气魄也。”这种呼唤，实际上也为中国共产党由具有青春精神的青年人才所创造埋下了伏笔。

中国共产党是永葆青春活力的政党。党的创立时期，一大批热血青年抱着救国为民的情怀，揣着振兴民族的希望，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道路，为创立中国共产党作出了难以复制的历史贡献。那时，在参与创立中国共产党的群体中，青年占了大多数，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发轫之时的磅礴动力。可以说，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青年就成为了党的宝贵财富，正因为有青年的觉醒和参与，中国共产党才获得了强大的青春力量。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历程中，青年也始终是党和国家倍加珍视的宝贵财富。

“青年者，国家之魂。”对于青年，中国共产党历来都高度重视、倍加爱护、激励鞭策，对青年的重视贯穿了中国共产党带领青年和全国人民开展革命、建设、改革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全过程，融汇入中国共产党领导青年与时代和实践相结合、展现青春力量的全环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大青年在党的领导下栉风沐雨、披荆斩棘、浴血奋斗，为中国革命胜利贡献了青春和力量。毛泽东同志指出，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可宝贵的，没有他们，革命队伍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青年们积极参与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和深刻的社会变革，群情振奋、激情满怀、勇挑重担，为祖国建设贡献了青春、建立了重要功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青年们走在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的最前沿，敢闯敢干、勇立潮头、锐意进取，展现了开放中国的精神风貌，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立足于“确保党的事业薪火相传，确保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远考虑，对青年和青年工作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怀，在多个重大场合多次强调青年和青年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特别指出“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我们党的未来和希望”；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专门谈到青年和青年工作；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发出“让青春在为祖国、为人民、为民族、为人类的奉献中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的伟大号召；在建党百年之

时作出“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的深情勉励；在此次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是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和青年工作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引领全党一同走近青年、倾听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教育青年、引导青年，号召全党代表青年、赢得青年、依靠青年，认为“青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未来的领导者和建设者。中国重视、关怀、信任青年，支持青年发展自身、贡献社会、造福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放飞青春梦想”。

从战略地位到目标任务，从职责使命到路径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工作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回答了我们党培养什么样的青年、怎样培养青年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为做好新形势下党的青年群众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沿着这些指引精神，目前，从中央到地方的青年工作机制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青年发展政策体系初步形成，为各行各业青年建功新时代铺好了路、搭好了桥。

二、新时代青年建功立业具有难得的机遇和优势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前所未有的成就、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目标，都为新时代青年建功立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难得的机遇和奋进的优势。

新时代青年处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生逢伟大时代，肩膺伟大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全面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民族复兴的能力和信心，中国共产党正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可逆转地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这样的伟大时代，青年人的生命历程与国家的前途命运、民族的奋斗目标历史性地融合在一起，青年建功立业的机遇不可多得，成长发展的机会空前涌现。

新时代青年深得党、国家和人民的信赖，生逢欣盛时代，可展青春风采。一百多年前，中华民族正遭受西方列强的蹂躏和欺凌，封建主义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沆瀣一气，当权当势者为虎作伥，残酷地剥削和压榨黎民百姓，国内政局动荡，社会风雨飘摇。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中国人处在为生存而挣扎的悲惨境地，不少青年陷入苦闷、彷徨和消极之中，无心力者沦落，有志气者奋起。百年后，时过境迁，天地易容，中国共产党成为拥有 9500 多万名党员、领导着 14 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中国更是一跃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青年人建功立业准备了优越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条件，80后、90后、00后已经完全可以挺直脊梁，平视这个世界，稳稳地跨步向前、奋勇精进。

新时代青年在困难面前敢于拼搏、善于斗争，生逢奋进时代，当燃青春激情。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青年在党的领导和号令下，亲身经历了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斗争，亲身参与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艰苦斗争中，亲眼目睹了西方新帝国主义和新霸权主义围堵打压中国、阻止中国发展和中华民族崛起的企图。他们经风雨、受锻炼、增智慧、长才干，在伟大事业中成长，在伟大斗争中觉悟，在伟大梦想中奋进，具有了把青春书写在民族复兴的史诗中、把热血挥洒在报效祖国和人民中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也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青春优势、素质优势和机遇优势。正如2020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90后”党员的回信中所指出的，青年人“不畏艰险、冲锋在前、舍生忘死，彰显了青春的蓬勃力量，交出了合格答卷。广大青年用行动证明，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是好样的，是堪当大任的！”带着理想、本领和担当，新时代的青年必将继续在为人民服务中茁壮成长、在艰苦奋斗中砥砺意志品质、在实践中增长工作本领，继续拼搏奋战、不惧风雨、勇

挑重担，必会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出绚丽之花。

三、奋力发挥创造历史荣耀和时代辉煌的青春力量

谁赢得了青年，谁就拥有了未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要源源不断把各方面先进分子特别是优秀青年吸收到党内来，教育引导青年党员永远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赓续党的红色血脉，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在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2017年4月13日，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导制定的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青年发展规划《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印发并实施，为扶持青年奋斗创业、投身民族复兴事业提供了政策支撑，也为帮助青年成长、激励青年奋进搭建起了发展平台，提供成长机遇。可以说，新时代青年建功立业的东风已经吹来，号角已经吹响，广大青年创造历史荣耀、书写时代辉煌、让青春绚丽绽放已经成为时代的风向标和风景线。

新时代的青年要建功立业，做到为党和国家分忧解难，就要按照党和国家的要求，切实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勤学，也就是要勤于学习，增长才干、增长本领。一方面要努力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高自己的政治站位和思想境界，另一方面也要广泛学习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

二是修德，也就是要不断锤炼意志、砥砺品格，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成为具有高尚品德和崇高人格的栋梁之才。三是明辨，也就是要不断提高思维能力和思想觉悟，善于辨析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思潮，不被乌云遮目，不被乱花迷眼，在各种纷繁复杂的干扰中把准人生奋斗的方向，塑造好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四是笃行，也就是要立足实际、脚踏实地、精于实干，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在扎实奋斗中成长，在勤勉务实中建功。

鲁迅先生说：“青年应该放责任在自己身上，向前走，把革命的伟大扩大。”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肩上已经有了沉甸甸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需要切实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坚定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在党和国家的爱护中成长，在满足党和人民的期待中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惟如此，才能不负青春、不负时代，最大程度地报效祖国和人民，最大程度地创造人生价值、实现人生意义。

【学习时刻|金句】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2022-05-09

党的十八大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随后，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改革开放后首次中央城镇化会议中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并表示“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这一重大论述科学判断了我国城镇化所处阶段，指明了推进城镇化的重要性，也为新型城镇化道路指明了方向。

一、为什么说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中国坚持推进新型城镇化，是既吸取西方国家城镇化发展的教训，学习借鉴成功模式，又将其与中国城镇化发展现状、实际相结合的重大战略部署。

首先，西方国家经验表明实现现代化必须注重城镇化。现代化是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多层面、全方位转变的过程。第一次现代化转型由工业革命开启，推动社会分工深

化细化，为传统农业转型创造条件，使大部分发达经济体从传统乡村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二战结束以来，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社会形态逐渐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化、智能化社会，知识和创新取代工业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信息化也反向渗透赋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驱动着现代化走向第二次转型。由此可见，城镇化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两次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其次，城镇化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空间载体和平台。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现代化和城镇化是世界历史的全新类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这意味着我国的城镇化要在两次现代化转型的叠加中进行，一方面，城镇化是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为新型工业化提供充分的生产要素支持和原始创新，为信息化提供优秀人才集聚和技术场景应用场所；另一方面，城镇化带动农业现代化，推动农业产业化水平的提升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在科学判断我国城镇化所处阶段的基础上，我国逐步确立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不同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更偏重于经济现代化，新型城镇化则更聚焦于解决“人”的现代化问题。以人为核心中的“人”至少包含三种含义：一是与“物”相对的“人”，即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传统的城镇化采用了以土地利用为核心的城市扩张开发模式，而新型城镇化把关注点回归到人的城镇化上来。二是与“群体人”对应的“个体人”。人的主体性是现代性最基本的问题，人在城市发展中所具有的主体资格、能力、素养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然而，我国过去以增长为核心的城镇化更多将“人”视为服务于城市建设的“资源”，而非城市发展的目的，相对忽视了人的城市权利，而新型城镇化呼吁让城市个体享有平等的生存、发展和参与机会。三是与“部分人”对应的“每个人”。过去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农民工、农民等相对弱势群体的发展诉求，而新型城镇化强调“惠及全民”，让更多人共享城镇化发展红利。因此，人的现代化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最终目的，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必然选择。

二、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了哪些重大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随着顶层设计逐步完善与地方积极探索，我国城镇化水平和质量大幅提升，新型城镇化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展顺利。一是1亿人落户任务提前完成。户籍制度改革不断深入，各级城市放开放宽落户限制，2021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4.72%。二是常住人口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高。居住证制度全面建立，义务教育、住房保障、就业服务等逐步覆盖常住人口，各类社保跨转流程持续完善。三是市民化配套政策体系基本建立。“人地钱挂钩”、农村“三权”维护和退出机制、城乡土地制度改革等成效明显。

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城镇化空间格局持续优化。一是城市群集聚发展要素作用不断增强。目前，19个城市群承载了我国70%以上的人口，贡献了超80%的GDP，多个跨省区城市群建立了一体化协商机制。二是都市圈内同城化水平显著提升。2021年以来，国家发改委先后批复南京、福州、成都、长株潭、西安等五大都市圈发展规划，各地积极探索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同城化发展机制。三是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成效初显。县城补短板强弱项工作扎实推进，如浙江省龙港市探索“大部制、扁平化、低成本、高效率”的新型设市模式，实现撤镇设市。

城市发展质量显著提高。一是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持续提升。2021年，城市公共供水普及率和污水处理率均超过97%，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超过7000公里，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5.56万个。二是绿色、韧性等新型城市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建成区绿地面积较2012年增加近50%，省、市、县三级疾控中心建设稳步推进。三是城市精细化、智慧化治理水平不断提升。创新基层治理模式，街道（乡镇）社会工作站超过1.5万个，数字化赋能政务服务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取得突出成效。

城乡融合发展步伐加快。一是城乡体制机制改革迈出坚实一步。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顶层设计完成，11个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基层探索有序开展。二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性增强。城乡统一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建立，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正式出台。三是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趋势明显。农村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水平全面提升，城乡基础设施统筹规划机制逐步完善。

三、新时期应该怎样更好地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依然存在不少问题。一是对“以人为核心”存在一定程度的认知偏误。尽管“重物轻人”的城镇化思维得以纠正，但当前城镇化的主要关注点仅停留在

人口城镇化层面，人的主体性尚未完全觉醒，距离人的现代化存在较大差距。二是解决城镇化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艰巨。城市群、都市圈一体化水平不高，中心城市对周边中小城镇带动不足。县城承载力不足，特大镇“小马拉大车”问题突出，特色小镇发展尚不规范。三是城市品质和城市治理能力有待提高。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我国“大城市病”问题依旧严峻，基层政府治理能力亟待提升，多元共治的治理格局尚未形成，数字化治理未能形成有效支撑。

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崭新起点，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未来十年，要想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保障全体居民公平共享城市现代化成果。从现代化的本质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推动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一是保障“新市民”充分享有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按照“实际管理服务人口”规模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重点解决好随迁子女教育问题和住房保障问题，并根据预测的未来人口规模“超前规划”。二是促进“新市民”以“主人翁”姿态全面融入城市。探索建立以“居住证+积分”为核心的公共服务梯度供给制度，积分可根据“新市民”参加志愿者服务等指标设定，对有突出贡献的“新市民”给予医疗、教育、住房等优惠政策，并授

予奖励荣誉。完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提升“新市民”就业技能。鼓励“新市民”参与社区治理和加入社会组织，表达其合理诉求，使其在城市中全面而自由发展。三是加快推进城镇化带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向乡村流动。建立普惠共享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品质趋同。发展现代化乡村经济，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持续提高农民收入。

以中心城市和县城为重点，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多中心多层次多节点的网络化城镇体系是现代化的空间载体。一是强化城市群和都市圈的主要平台作用。以促进各类要素在省域间、城市间自由流动为重点，建立一体化发展协同机制。推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环境治理等协调联动，避免重复建设。二是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推行定点帮扶，有条件的城市可采用科创飞地模式，借中心城市的人才实现产业跃迁式发展。三是分类推进县城城镇化建设。处于中心城市周边的“卫星县城”应主动融入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格局，承接中心城市的产业和人口疏解，与中心城市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不在中心城市辐射范围但自身产业基础较好的“节点县城”应注重产业和公共服务补短板强弱项，加强与周边区县协作，在市

场机制作用下探索“小都市区”发展模式。不具有区位和产业优势的一般县城可借助自身比较优势与大城市合作，通过“飞地经济”等模式为本地农业转移人口和返乡农民工提供就业岗位。

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治理现代化。城市功能品质的提升是现代化导向下城镇化发展的动力。一是重视和落实新型城市建设理念。这包括：优先提升预防和应对疫情、洪涝等重大突发公共事项的能力、全面实施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保障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建设韧性城市；为居民营造以人为尺度的“三生融合”城市空间，即推进“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建设宜居城市；优化创新创业环境，积极培育“创意阶层”，面向居民的消费升级打造新业态，形成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良性循环，建设活力城市；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注重城市个性化发展，建设人文城市。二是加速破解“大城市病”问题。超大特大城市需要根据城市综合承载力，合理控制城市规模和人口密度，疏解非核心功能，走精明收缩、高质量集约发展道路。三是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管，推动城市治理重心向基层下沉，鼓励社会主体参与城市治理，运用数字化手段赋能政务服务和社会治理，不断提升城市科学化、精细化、智慧化管理水平。

【专论】绘就“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宏伟蓝图

2022-05-20

编者按：近日，《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正式印发，这是我国第一部国家层面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任务，对“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作出总体性规划。

在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发表六周年之际，理论部邀请参加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部分专家、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知名学者和青年学者，深入探讨如何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推动理论创新、服务科学决策、提升文化软实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不断创造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业绩，为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提供坚实学理支撑，为党的二十大召开营造良好氛围。

本期刊发记者专访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韩震教授的文章《绘就“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宏伟蓝图》。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进入了扎实稳步推进的“快车道”，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 2016 年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纵观我国近年来在“三大体系”建设中取得的成果，韩震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总结：学科建设方面，我国在着力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知识体系的同时，也在不断开拓国际视野、深化国际形象；学术评价建设方面，由过去的量化评价向多元标准评价转变，由过去的重数量向重质量、重创新、重实际效果转变；话语体系建设方面，我们逐步摆脱了对国外评价标准的过度依赖，建立了自主的评价导向和体系，在引导学术创新的“中国特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的“硬实力”发展世界瞩目，“软实力”发展也不应缺位

既往取得的成就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韩震表示，近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工作者的科研创新意识得到了不断的提高，大家逐步认识到，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不应仅仅是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问题思考的翻译和照搬。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必须研究中国之问和时代之问。同时，随着党和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各项投

入和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大，为我国培养出大批学科基础理论扎实、国际视野开阔的优秀人才提供了切实的保障。

在此基础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这是我国第一部国家层面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韩震认为，《规划》的出台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及时回应了我国当前面临的重大现实需求。近代以来，我国由于经济上的落后造成了社会思想意识上的落后，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在全球始终处于“跟跑”地位，缺少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和相关的构建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下，我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实现了从“跟跑”向“并跑”的进展。但我国当前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仍与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并不相称。作为一个拥有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硬实力”发展在全世界范围内有目共睹，“软实力”发展也不应缺位。这就要求哲学社会科学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方面构建起自主的知识体系，从而与经济社会发展形成相互支撑，向世界文明展现中国理论、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规划》明确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前进方向

《规划》对“十四五”时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开展的思想、需要坚持的主题主线、面向的方向目标等进行了明确说明，为下一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开展明确了具体的方向。韩震表示，《规划》提出的具体目标指明了“十四五”时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四个重点方向。

一是要推进新时代党和国家重大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本身就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开展的重大时代性课题，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对其他学科的研究开展具有方向性和方法上的指导作用。从价值取向来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开展要以人民为中心，以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中心。从方法指导来看，马克思主义坚持的“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是其他学科开展研究必须遵循的前提和方法。因此，对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态和知识建构的研究是“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开展的一个重点和方向。

二是要建构基于自主知识构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彰显中国特色，就要对中国历史上各个领域的思想资源进行清晰的梳理和整合，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从而为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打好基础。

三是要扩展国际视野，推出具有世界水平的研究成果。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也要跟上步伐，不能将视野仅仅局限于中国范围之内，更不能闭门造车。站在“两个大局”的高度，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要在全球视野下开展，尤其是要加强对国际问题和国别问题的研究。过去我们国家对国际问题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对一些发达国家和大国的研究，对全球性问题的研究存在断层，但是作为一个大国，我们需要加深对整个世界的认识理解，由此才能更好地推进我国与世界各国开展交往合作。

四是要大力推进经济理论体系建设。过去我们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创造了众多的“中国奇迹”，但是在经济理论方面没有构建起真正具有世界影响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系。大力推进我国经济理论体系建设不仅是“十四五”时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也是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的必要基础。建构中国自主经济理论必须有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的参与。

发挥高校优势，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培养更多高质量人才

《规划》提出要加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建设”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在这一过程中，高校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五路大军”中最重要的力量，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国际交流等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韩震指出，高校在队伍建设和智库建设方面具有的最大优势就在于汇集了丰富的人才资源。一方面，高校的科研工作者基本覆盖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各个学科，为跨学科合作交流搭建了畅通的平台和环境；另一方面，高校的科研工作者在年龄上没有明显断层，因为有学生作为新鲜血液，“老中青”三代的合作与交流不仅有助于发挥不同年龄层各自具有的经验、创新优势，也有助于形成思维互补，开阔科研视野。

对于未来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韩震提出了三点期许：一是要培养能够深入社会、具有调研能力的人才。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本质上是对人、对社会的研究，需要科研工作者了解社会，才能真正把目光聚焦于时代的社会之间、人民之间，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二是要培养能够灵活运用现代科技且具有思辨能力的人才。互联网时代海量的大数据为科研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科研工作者一方面要学好用好现代科学技术，为学术研究提供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要培养从广泛的资源中凝练出时代性问题的思辨能力。三是要培养紧跟时代，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要让世界了解中国声音，首先需要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掌握全球背景下世界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的态势，从而能够在最前沿的领域与不同的思维展开交流。

【学习时刻|金句】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

2022-04-01

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做主旨演讲时提出，要“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并强调“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这一掷地有声的话语，成为指导各地改革开放实践，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重要遵循。

2019年10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核通过了《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从国家层面夯实了营商环境优化的法治基础，一方面标志着提升营商环境已成为全国全社会的共识，另一方面标志着营商环境水平已由各地及各级政府的基层探索和经验总结上升为国家级战略。2020年，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但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仍创下5年来最快增速，并一举超越美国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第一大国。在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从2018年的第78位跃升至2020年的第31位，已跻身全球前40位，并连续两年入列全球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2021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11493.6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4.9%；折合 1734.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2%。可以看出，中国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正结出累累硕果，世界看得到，企业感受得到。

夯实营商环境的公平基石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土质优劣直接关系到市场主体活力和经济发展动力。长期以来，市场主体之间形成的事实不平等，成为困扰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核心顽疾，国有、民营、外资在市场准入、机会获得方面存在差异，迫切需要通过法治化手段解决这些问题。2019 年 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公布，外商投资企业的准入前国民待遇以立法形式得以保障。2019 年 10 月，《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出台后，“两平一同”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即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各级政府不得偏向某些企业或限制其他企业的合法权益，不能因为投资者所有制的性质、规模、盈利能力、所在地等而有所歧视。这些法律条例的实施，都为夯实公平的营商环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更具体来看，为保证公平的市场环境，政府的政策、法规、服务措施等应该做到公开、透明，形成可预期的政策、制度、法律环境，例如我国始终强调要全面落实的“负面清单”制度（即国务院以清单方式明确列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禁止和限制投资经营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级政府

依法采取相应管理措施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就保证了各类市场主体对于哪些领域不得投资、哪些领域有所限制均有清晰而明确的知悉。

为保证市场规则更加公平有效, 必须确保政务更加公开透明。在行政审批、市场监管、政务服务的基础上, 将政务公开制度化、标准化、信息化是打通服务市场主体“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手段, 更是打造高质量营商环境的必要一环。要加强营商环境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考核评价, 推动提升市场体系的运行效率、规范程度、监管水平, 加快破除市场隐性壁垒, 打破“玻璃门”, 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 保障各类市场主体能够依法平等使用各类生产要素和公共服务资源; 要积极建设数字政府、数字社会, 更好实现公共信息资源实时动态共享和开放应用, 打造智慧、便捷、高效的线上线下一体化政务服务体系。

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 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 努力参与国际分工, 通过“干中学”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法宝。在改革开放初期, 中国对接国际市场、引进外资的法宝包括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各地优惠的土地、税收政策等。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 综合国力的提升,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推进, 只有通过塑造国际一流的

营商环境，巩固并发展中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世界制造业中心、最受欢迎的外商投资目的地、全球最大的单体消费市场的地位，才能在日益严峻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建设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必须秉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基本原则。

市场经济的竞争，本质上是营商环境的竞争。一流营商环境，必须以市场化为基础，破除不合理的体制机制障碍，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把市场机制健全起来，把市场主体活力激发出来，以此来促进投资兴业，经济发展。市场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各类市场主体机会均等；其次是保证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包括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自主经营权、财产权、知识产权，也包括保护中小投资者、治理拖欠企业账款、加强失信联合惩戒、完善纠纷解决机制等内容；再次是通过“放、管、服”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体系，最大限度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深刻阐述了这一重要论断。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政府职能部门首先要做守法守约表率，突出公正监管，落实监管责任、创新监管方式、规范执法行为；其次，需要围绕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对政策制定、法规政策公布和解读咨询、政策评估和清理、

政务诚信以及政府责任、行业协会商会责任、中介服务机构责任、公用事业企业责任、市场主体强制退出制度等方面进行规范化发展。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中，少数地方和部门不讲信用、不守承诺、不按制度办事、不按政策落实等问题依然突出，这就需要依法规范行政权力、规范行政决策程序，健全政府守信践诺机制，增强政策制定实施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提高依法行政水平。要切实把平等保护、政企分开贯彻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环节，让亲商、惠商、便商理念成为国家和地方立法工作的重要指针、用法治之手为各类市场主体架起了一张“防护网”，让企业经营更有安全感。

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就是要让各类投资者包括外商投资者吃上定心丸，保证他们获得公平的竞争机会，享受公平的市场环境，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把对外开放过程中优化营商环境的举措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要始终对标国际一流、最有竞争力的营商环境标准，瞄准主要发达国家先进经验，同时学习在国际社会提升快、优化营商环境幅度大的发展中国家经验；要主动适应全球贸易、投资的新变化，按照市场规律创新监管、服务模式，适应新业态、新模式，让我们的经营、国际贸易、国际投资更便捷。不仅如此，还需要对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的包容审慎监管，给予创新一定的政策容忍度，在制度创新方面力争国际前沿。

将优化营商环境进行到底

营商环境是市场经济的培育之土，是市场主体的生命之氧，良好的营商环境，既是一个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生产力，也是不可或缺的文化软实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只有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才能真正解放生产力、提高竞争力。“十四五”新征程乃至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必须始终秉持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的“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不断将优化营商环境进行到底。

2021年11月，国务院了印发《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决定在北京、上海、重庆、杭州、广州、深圳6个城市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主要包括进一步破除区域分割和地方保护等不合理限制；健全更加开放透明、规范高效的市场主体准入和退出机制；持续提升投资和建设便利度，支持市场主体创新发展；进一步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优化外商投资和国际人才服务管理，等等改革措施。此后试点城市集中发力，如北京发布了优化营商环境的5.0版改革，涉及包括保护市场主体、维护公平竞争、知识产权保护、行政审批、投资建设、政务服务、监管执法、外资外贸等12个方面362项任务，将于2022年底前全部完成；上海则从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投资环境等10个方面提出172项改革举措，重庆、杭州、广州、深圳也纷纷依托各地的经验开展全面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部署和制度创新集成。

这些改革措施，有的是政府服务中的难点、痛点，有的是借鉴和学习兄弟省份和城市的一些好的做法，有的是常年改革成果的继续提升和完善，有的是敢为天下先的创新之举。在试点城市政府的统一部署下，每个部门、每个辖区都拿出了切实可行、拳拳到肉的改革措施，推进制度创新和流程再造，增强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借鉴国际经验推进“放管服”改革，拓展覆盖面、扩大受益面，每年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为全国营商环境建设作出贡献，也为将优化营商环境进行到底提供了良好优质的“土壤”。

【学习时刻|金句】以制度型开放引领新一轮 高水平对外开放

2022-03-16

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会上，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市场这么大，欢迎大家都来看看。他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我们将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持续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一个“大”字，充分展现了中国市场的魅力和吸引力，道出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实力和底气，一个“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彰显了中国更加开放包容的自信姿态。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冲击，我国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新发展阶段。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在此背景下，我国要持续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就需要更加重视制度型开放，以高质量的制度型开放引领新一轮的高水平对外开放，让世界共享中国开放机遇和发展红利。

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底气何在？

一方面，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有待发挥。我国拥有 14 亿人口的国内消费市场，其中中等收入群体逾 4 亿。如此大规模的市场体量，不仅需要国内企业和要素的积极参与，也需要引入国外企业、产品和各类要素。为此，我国自 2012 年以来不断推进扩大进口战略，多次下调甚至取消部分产品进口关税。目前，我国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 1449 个税目平均税率已降至 6.9%，关税总水平降至 7.4%。世界各国企业通过出口高质量产品或输出技术、资本、劳动力等要素进入中国市场，不仅可以助力我国供给层次和供给质量的持续跃升，也可以分享我国经济发展红利，实现互利共赢，促进世界经济复苏。

另一方面，国内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近年来，我国持续进行“放管服”改革，大量推出行之有效的惠企政策并以制度、规章等形式加以固化，以清单形式不断明确政府行为边界，规范政府行政行为，从而优化市场营商环境，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提升中国市场规模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我国持续缩减外商来华投资限制措施，2020 年我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已减至 33 条，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分别减至 30 条和 27 条。《全球营商环境报告 2020》显示，2019 年中国营商环境位居全球第 31 位，其中，执行合同效率处于全球第一梯队，其中

体现司法制度与工作机制的“司法程序质量”指标领先，“保护中小投资者”指标大幅上升，这是我国近年来为优化营商环境所做出的结构性改革和努力的直观呈现，有助于进一步减少并打消其他国家对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疑虑和不合理指责。

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面临哪些挑战？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疫情的叠加冲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都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

传统开放优势正在减弱。以往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基于土地、劳动力等低成本要素红利发展起来的，但是，伴随中国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各类要素成本亦不断增加，资本、劳动、土地等传统要素边际报酬逐渐递减。以劳动成本为例，2002 年中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 12422 元，到 2019 年中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上涨至 90501 元，中国低成本要素红利的传统开放优势正在减弱。

新型竞争优势亟待建立。在国际贸易中，产品和服务的知识密集特征日益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下，制度质量所决定的交易成本成为一国比较优势的重要影响因素，以人才、技术、数据为代表的创新型要素对贸易体制的稳定性、可预期性以及由制度环境所决定的交易成本也更为敏感，仅凭降低流动性壁垒、暂时性优惠政策等难以集聚全球高质量要素。

因此，发展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突破传统思维限制，将开放拓展至国家治理层面，需要政府积极主动在制度层面构筑新的竞争优势，为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赋能。

制度规则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正经历历史性变革。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国际力量对比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这进一步引发了中美等国在制度和战略上的结构性矛盾，美国试图改变现行的多边贸易体制，推行更代表发达国家利益的高标准贸易投资规则，约束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经营行为，WTO 改革工作屡次停摆。这些变化更深层次暴露出传统全球治理体系的局限性，并引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组织架构、决策机制、权利分配等方面的冲突。这种冲突本质上是新制度供给与既有制度之间的竞争，更是各国之间的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主导权竞争。中国加快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什么是制度型开放？如何以制度型开放引领新一轮更高水平的开放？

不同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制度型开放是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时代的内在要求，它更聚焦于规则和制度层面的改变，致力于形成与国际贸易和投资通行规则相衔接的、规范透明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

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其实都是制度型开放的探索与实践。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这是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强调，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需要“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需要更加重视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边境内措施的开放。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是党中央对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变化及发展趋势的深刻把握，是新时代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必然选择。

制度型开放，其目标之一就是在遵守并对接国际通行规则的基础上，以制度输入提升本国制度体系先进性，从而依靠制度开放参与国际经贸规则重塑，加强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为其他国家制度体系的调整与完善提供经验，并在这个过程中，以“国内规则国际化”化解规则竞争压力。“十四五”时期我国加快推动制度型开放，要坚持先破后立的总体思路，关键在于促进规则变革、优化制度供给、提高制度质量。

第一，更大力度强化国内外规则对接，推进深层次市场化改革。新时代我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点是服务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这就需要更深层次地改革国内体制机制弊病。我国应更加主动对接国际通行规则，更大力度清理国内

不合理、不相容的法律法规，统筹优化边境制度设计与边境内制度设计，并增强二者间的协调性，进一步提高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主要发达经济体经贸规则的相容性，从而以高水平开放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公开、公平、稳定、可预期的制度体系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营商环境。

第二，积极参与 **WTO** 改革，促进国际经贸规则深度调整。**WTO** 改革的实质在于重构国际经贸规则，使之更加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经贸环境，符合各成员方的普遍利益，使全球化更加自由、公平和可持续。目前，完善数字贸易发展的制度框架是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谈判的前沿议题，为我国参与 **WTO** 改革和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提供了重要平台。我国应首先明确国内数字贸易发展现状以及与其他数字贸易大国和现有国际数字经济治理规则的差异，在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秉持协商一致原则，支持和引领各国在 **WTO** 框架下开展数字贸易、数据流动安全、电子商务合作、数字知识产权等国际经贸规则谈判，寻求广泛共识，培育世界经济新的增长极。

第三，积极供给国际公共产品，推动完善规则导向的全球治理体系。由于美国仍是世界头号强国、美元仍是世界第一大货币，期待美国主动改变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态度和传统全球治理体系实现自我修复是不现实的，这就需要有其他国家来引领全球治理体系进行变革。这种变革并非是颠覆现有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而是对传统体系的补充与完善。我国应积极参与全球制度性公共品供给，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标志性的制度性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尝试，强调经济治理的普惠性、包容性和发展导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呈现。我国可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平台，基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共同利益，优先在“一带一路”框架内推行中国规则体系和治理方案，加强与沿线国家的规则对接与协调，助力其解决市场机制不健全、基础设施不完备、收入分配不公平等发展问题，增加贸易伙伴国的认可与参与。

【学习时刻|金句】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2022-03-0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党的十九大报告，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博鳌亚洲论坛、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多个国内外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只会越开越大。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世纪疫情阴霾笼罩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金句”，正是意在表明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鲜明态度。

为何多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开放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出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也名列前茅，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坚定支持者，也是重要建设者和主要受益者。进入新时代，我们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准确判断国际经济形势新变化、深刻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以更加积极有为的行动，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国不断

克服保护主义的困扰，实现了从融入全球化向推动乃至引领全球化的战略转型。从努力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到积极参与促进高标准区域经济一体化；从不断降低关税、扩大外资企业市场准入到构建自贸试验区、海南自贸港等对外开放新平台，从全面实现制造业开放到逐步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中国从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不断向制度型开放推进，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形成。

对外开放，什么最重要？贸易。开展对外贸易，出口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不仅能够获得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的利益，而且能够促进产业发展，形成产业集群，获得范围经济利益。出口贸易的发展会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出口产品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收益。比如，我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给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增加了收入，促进了共同富裕。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分工能够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社会财富，通过交换，实现物质福利的增加。国际贸易也是如此。而分工的广度和深度取决于市场范围的大小。企业面对世界市场生产，有着几乎无限的发展机会。广东东莞、浙江义乌和苏南地区的发展，美的、格力、阿里巴巴、红豆等企业的崛起，就是明证。所以说，贸易的繁荣后面，是产业的集聚发展、城市的兴起和人民的富裕。

中国不仅是出口大国，而且是进口大国。通过进口先进技术和原材料，弥补了国内资源的不足，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升；通过进口优质高端消费品，弥补了国内供给的不足，满足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收入不变的假定下，提高了福利水平。中国的巨额进口，也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增长提供了强大动力，实现了与世界的互利共赢。通过进口竞争，迫使国内企业尽量采用先进技术，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以提高市场竞争力。贸易必然带来人员的交流、文化的传播和思想的交换，通过文明互鉴，对一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进步会产生积极影响，有助于促进人们思想的进步、思维方式的改变和观念的更新。尤其是现代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孕育出来的精神文明成果，诸如效率观念、效益观念、服务观念、冒险精神、开拓进取精神等，对于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尤为重要。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大胆吸收一切有益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精神文明成果，使人民逐渐摆脱封建的、小生产的以及“左”的思想的束缚，抛弃了封闭落后、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的精神包袱，在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社会全面进步。贸易的作用是如此重要，以致被称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如何依托跨国公司及外资企业等进一步扩大开放？当代经济全球化的最重要特征是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生产要素特别是高端创新

要素，流向那些投资环境好的国家和地区。什么是好的投资环境？简言之，就是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程度高，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与国际惯例高度一致的地区。资本流动，尤其是直接投资，不仅仅是资本的转移，而是资金、技术、管理、人才等高端要素的“一揽子”流动。外资流入促进经济发展，产业兴旺，商贸繁荣，人民生活富裕，正是广东、江苏、福建等沿海利用外资大省的生动现实。跨国公司本土化发展，还会带动本地配套产业的发展，全面融入国际价值链，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增加劳动者收入。外资企业带来更具竞争力的产品、技术和服务，有助于在高水平竞争中创造价值，实现互利共赢，实现开放条件下的高质量发展。随着服务业的开放，跨国公司还会把公司总部、营运中心、研发机构等设立在投资国，为引进高端服务业的国家和地区带来高收入工作岗位，为本土高端人才实现人力资本价值带来机会，有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当然，对外开放从来都是双向的。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中国抓住机遇进行全球布局，充分利用我国市场潜力、建设能力、资本实力，在全球范围内争取能源资源和基础建设项目，收购优质资产、营销渠道、核心技术、关键设备，吸引高端人才。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等“走出去”，在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舞台上，通过整合全球生产要素进行国际化经营

活动，提升创新能力和财富创造力，有些企业则成长为有影响的跨国公司。

对外开放如何带动经济发展，从而促进共同富裕？我们首先要从基本理论上弄清楚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能够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增进社会财富，提高人民的福利水平。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人民收入基本上实现了同步增长。而对外开放水平越高的区域，经济增长越快，人民生活越富裕，而且城乡之间、各种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越小。比如江苏昆山，包括苏州，开放程度江苏省内最高，经济最发达，居民收入高，而且实现了共同富裕，在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走在了全国前列。而中国相对后发展地区，开放程度也较低。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区域之间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就是开放水平和开放层次的差距。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要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验表明，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向技术创新驱动的跨越，大幅度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和科技贡献率。很明显，扩大对外开放，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尽可能地利用和整合全球创新要素提升我国企

业乃至整个国家的创新能力，显得十分重要。我们要克服保护主义和世纪疫情带来的困扰，坚定不移实行开放式自主创新战略，通过更高水平、更深层次、更宽领域的开放，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全球创新要素聚集，与我国企业创新发展、融合发展。

【专论】以马克思主义为引领推进哲学社会科学蓬勃发展

2022-05-17

编者按：近日，《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正式印发，这是我国第一部国家层面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任务，对“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作出总体性规划。

在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发表六周年之际，理论部邀请参加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部分专家、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知名学者和青年学者，深入探讨如何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推动理论创新、服务科学决策、提升文化软实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不断创造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业绩，为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提供坚实学理支撑，为党的二十大召开营造良好氛围。

本期刊发记者专访吉林大学党委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韩喜平的文章《以马克思主义为引领推进哲学社会科学蓬勃发展》。

问：作为第一部国家层面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的出台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韩喜平：作为我国“十四五”规划体系中的一个子规划，《规划》本身就体现了在新的发展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发展的高度重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首先，这是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两个大局”的高度对“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作出的总体性规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要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需要我们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不仅要用中国理论探索中国发展，构建理论中国、学术中国，还要着眼于解决世界问题，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其次，《规划》突出强调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功能。人类社会的伟大进步正是建立在不断地总结经验并将其上升为基本的理论、不断地认识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之上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总结中国之治的宝贵经验，同时也需要担负起为建设现代化强国贡献智慧的重要历史任务。

再者，《规划》实事求是分析了我国目前哲学社会科学存在的不足与问题。比如，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滞后于社会发展，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影响的标识性学术概念不多，没有建立起完善的中国自主理论模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理化阐释较弱，政治性与学术性话语不同步、对于本土经验的独特性没有足够的理论支撑。当中国经验事实与西方理论模型发生碰撞时，学界甚至会“进行削足适履的解释”。此外，目前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型难以解释中国四十多年来的高速发展，更难以概括和呈现中国经验，导致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没有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发展优势、文化优势转化为理论和话语优势，“卡嗓子”的问题亟需解决。

问：《规划》为我国“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指明了哪些重要方向？

韩喜平：第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必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只有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才可能提出更多具有标识性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模型。

第二，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引领，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

坚持。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服务主体是人民，所开展的研究工作都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有聚焦于当下人民的真实生活问题，直面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努力揭示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大趋势，才会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富有鲜活的生命力、强大的影响力。

第三，要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取得实质性进展。培养国际顶尖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和后备中青年人才，形成符合哲学社会科学规律、建立调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积极性的制度体系，产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本土化和竞争力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成果，发展中国理论，繁荣中国学术。

问：《规划》提出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需要着眼于哪些方面？

韩喜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我们党不断坚持理论创新的基本目标，也是马克思主义得以与时俱进、切实可行的根本经验。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政治的清醒来自于理论的坚定，历史已经证明，坚持理论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才使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才使人民生活得到日新月异的改变，社会主义道路得到了勇往直前的动力。

要与时俱进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理清问题的思路、把握历史的脉络、总结发展的规律、凝练深刻的发展理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社会科学化处理，进行理论化融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现代知识体系和现代思想脉络中，真正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要总结中国成功的基本理论，深刻解读中国奇迹背后的道理、学理、哲理，对于中国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解答。有生命力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就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要构建立足中国国情、破解中国问题、解释中国实践、推动中国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从历史、实践、理论、制度多方面深入阐述，从整体性、系统性、科学性的视角展开研究，在阐释中国发展方案的同时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

要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大众化传播。用学术讲政治，实现政治话语学术话语的统一，升华政策经验，并转化为一般的力量建构。

要围绕新世纪世界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列宁在论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时曾指出：“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

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

面对当前世界，我们要像马克思那样科学地检验以往的理论，要直面时代之问、世界之问，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提出原创性的中国答案。

问：《规划》提出的“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对高校和学者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韩喜平：高校是哲学社会科学“五路大军”的重要力量。近年来，高校建立起了一大批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还有大量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点和硕士点，在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自然也是主力。当前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对于高校和学者都有着新的要求：

对于学科建设，一方面，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做强做大。特别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理化、学科化建设，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统一，加强对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理化阐释、学术化建设、学科化设置。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加大经典著作编译和研究力度，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继续推进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等平台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领航。坚持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专业性地回答实践问题，并与时俱进地推进各学科的发展，根植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在探索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成长。

话语体系建设方面，要面向中国问题，构建中国理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深刻把握这一时代潮流和历史机遇，努力发挥哲学社会科学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光荣使命，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时代契机。

人才培养方面，要多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人才。形成一批方向明、主义真、学问高、德行正的理论队伍，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在增进文明交流中发挥独特作用，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要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发挥思政课作为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性课程的重要作用，要用深刻的学理影响学生，用真理的力量感染学生，培养堪担民族复兴重任的新时代青年。

问：高校如何为“形成党的创新理论学术支撑体系”做出贡献？

韩喜平：高校是知识分子的聚集地，是思想的集散地，是知识传承的重镇。为形成党的创新理论学术支撑体系做出贡献，高校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坚持理论创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各学科建设，用各学科知识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改变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在某些领域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的“三失”局面。做好这一工作，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工作者的努力，也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加强学科的学术性、学理性和思想性、规范性建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各学科发展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形成更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和更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理化成果。

二是用中国经验丰富中国理论，用中国理论破解中国乃至世界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重要资源，总结其中的成功经验，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智慧，是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职能。我们需要且也能够以马克思主义的智慧破解世界问题，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的思想。

三是促进基础学科健全扎实、重点学科优势突出、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创新发展、冷门学科代有传承，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学科

间的良性互动是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作为一个复杂系统赖以运行的基本存在形式，而且学科总是在不同学科间的融合交流中不断发展的。要紧跟时代，厚植基础，博采多学科之长，面对综合性问题，形成深化理论建构。

四是搭建平台，汇集人才。高校是人才的汇集地，高层次人才是学校事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要发挥高校优势，深入实施人才集聚计划，在建好引聚平台的基础上，推进人才体系建设，研究编制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发展规划，同时，深入实施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发挥智库平台引导作用，提出更多建设性的重大建议和标识性原创概念。

五是培养人才，保证后继有人。人才培养是高校最基本的职能，高校要加强对青年人才的扶持，实施以育人育才为中心的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发展战略，建设种类齐全、梯队衔接、结构合理、专业突出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体系，培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培养拔尖领军人才，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

【专论】“五个有利条件”：奋进新征程的 科学指引

2022-03-30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深刻阐明分析了我国发展仍具有的五个方面战略性有利条件。“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持续快速发展积累的坚实基础”“有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有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突出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历史自信、强烈的责任担当，深刻揭示了新时代我们怎样继续创造新辉煌的成功密码，为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提供了思想武器，指明了前进方向。

揭示规律：我们靠什么走向未来

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大国博弈日趋激烈，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临门一跃”的关键时期，我们还会经历许多可以预料、难以预料的艰难险阻，甚至还会面对难以

想象的惊涛骇浪。在这样一个重大历史关头，我们应该怎么看，怎么办？

认识把握客观规律、科学运用客观规律，是我们党百年奋斗取得重大成就的法宝之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必须以对客观规律的不断深入认识为前提。习近平总书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作出“五个有利条件”的重大论断，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踏上新征程、创造新辉煌的历史必然性和可能性，科学回答了我国未来发展的政治保证、制度前提、物质基础、社会支撑、精神动力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大大深化了我们党对前进道路的规律性认识。这些新探索和新成就，与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总结一脉相承，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战略谋划：我们如何掌握历史主动

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战略上的科学谋划，首先需要是对时代特征、历史趋势、力量格局的清醒认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基本判断，也是我们谋划党和国家工作的基本出发点。正是从这个基本点出发，我们准确把握发展规律，科学判断国内外大势，客观分析影

响我国发展的主要矛盾，为党和国家事业进一步发展作出了新的战略谋划。

“五个有利条件”是对我国未来发展的根本性、长远性、全局性优势所作的系统概括。“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我们沉着应对重大风险挑战、向着宏伟目标奋勇前行的根本政治保证，也是其他四个有利条件存在的根本前提。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就谈不上其他四个有利条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坚实的物质基础”“有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有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则分别强调了我国未来发展在制度、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战略优势。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五个有利条件”是在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百年不懈奋斗中积累形成的，是全面的、可持续的，是不会因一时一事的影响而改变的战略优势。踏上新征程，面对新挑战，“五个有利条件”就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牢牢掌握历史主动权的信心所在、底气所在。

引领方向：我们怎样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五个有利条件”是规律揭示，是战略谋划，同时也是开创新局的方向引领，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行动纲领。

党的坚强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定海神针”。新的征程上，我们要继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确保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向前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新的征程上，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

坚实物质基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前提。新的征程上，我们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新的起点上实现平衡健康可持续发展。

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基本保证。只有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离开社会稳定，不仅改革发展不可能顺利推进，而且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丧失。新的征程上，我们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社会建设，不断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继续创造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为我国改革发展提供强大支撑。

自信自强是中华民族的固有品格，也是百年来始终激励着中华儿女奋勇向前的强大精神力量。新的征程上，我们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保持政治定力，准确把握时与势，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情，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好更有力地推向前进。

认识有利条件，是为了更好前进；运用好有利条件，才能更好地奋进新征程。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我们一定能够抓住用好战略性的有利条件，砥砺前行，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不断创造新的发展奇迹、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专论】补短板、弥弱项，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主创新

2022-02-24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当前，科技已融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引擎，是应对许多全球性挑战的有力武器，也是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卡脖子”技术成为大部分国家在实现科技自主创新过程中的重要难题，我国亦是如此。那么，我们该如何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对此，我们专访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丁明磊。

Q1：中国是工业大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中国工业的发展中，不少领域却面临技术“卡脖子”情况，这种情况是怎么造成的？

丁明磊：进入 21 世纪，我国科技事业发生了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重大变化，在科技重点领域加速赶超，一些前沿方向开始进入并行、引领阶段，科技实力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目前，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但是与欧美发达国家

一百多年的工业化积累相比，我们在科技领域仍然有较大差距。基础科学研究短板依然突出，底层基础技术、基础工艺能力不足，在工业母机、高端芯片、基础软硬件、开发平台、基本算法、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等方面瓶颈仍然突出。当外部环境变化时，我国很多领域都存在的被“卡脖子”的风险就会凸显。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发展面临的环境、任务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复杂程度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

“十四五”时期及未来一段时期，是建设科技强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大国战略博弈加剧等多重因素叠加和交汇，各类不确定性和挑战增多。

“卡脖子”问题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打好根基。“卡脖子”问题是一个综合性问题，涉及到基础研究、产学研结合、人才培养等科技领域的方方面面，要解决若干领域的“卡脖子”问题，除了要进一步强化基础理论研究，还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和机制。

突破“卡脖子”问题并非纯粹的技术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一方面要加强创新要素供给，保障产业基础能力提升；另一方面要以解决战略领域重大需求为牵引，对产业创新能

力提升进行系统部署；还需要在创新环境和创新主体之间构建一个完善的创新生态系统，实现多领域、多主体的共同协作，使创新资源能够持续积累并有效配置，从而打破国外的技术垄断，解决我国产业发展中面临的“卡脖子”问题。

Q2：破解“卡脖子”技术难题，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您认为，当前我国有哪些需要弥补的短板和弱项，未来如何发力？

丁明磊：其一，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已成为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要特征是创新驱动，科技创新能力的高低决定了经济发展质量。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经济发展还处在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过程中，经济发展质量还不够高。最大的短板在于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突出表现为企业和产业创新能力不强，缺乏重大原始性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显示，我国工业的主体部分仍然处于国际竞争力较弱的境况。如果把中国工业制成品按技术含量低、中、高的次序排列，其国际竞争力大致呈U型分布，即两头相对较高，中间显著较低。但正是在统计上分类为“中技术”的行业，例如化工、材料、机械、电子、精密仪器、交通设备等，实质上恰恰是工业经济的主体和基础，是决定工业技术整体素质的关键支撑部门。从技术和工艺水平来看，大多数工业行业的技术制高点均不在我国，而即使是一些国际竞争力较强、性价比高、市场占有率

大的中国产业，其核心元器件、控制技术、关键材料等均依赖国外。

其二，我国的技术知识体系和产业知识体系不牢固，尤其是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一旦知识源头被切断，可能出现“有市场而无技术”的风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些产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通过引进成熟技术快速形成生产能力，粗放式发展而忽视了产业创新基础能力建设，没有形成内生的技术创新机制。由于国际大环境的变化，使得我国知识交流的渠道，以及过去主要依赖的“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路径受到阻碍。传统的以先进技术替代落后技术的企业技术升级策略无法解决产业基础的系统性提升困境，技术知识体系和产业知识体系基础不牢，使得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其三，西方技术霸权使得我国科技和产业发展可能陷入“低端锁定”的风险。主要西方发达国家已经从市场主导的技术竞争向国家控制的技术霸权彻底转向，某种程度上已明显上升为国家意志。技术霸权已内化为一种政治文化习惯、政治规范与战略政策指引，并且是由多部门联动发起的全政府战略。西方发达国家不仅会利用市场优势和先进技术对发展中国家的价值链升级实行阻截，还会通过其垄断地位建立不对称的价值链治理方式，这些大大增加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层面“弯道超车”的难度。

其四，在过去一段时间产业技术体系建设缺乏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行业关键共性技术研发主体缺位，缺乏长期稳定支持，产学研结合的体制机制、组织形式不适应产业技术重大创新的需要、缺少产业技术层面的战略合作，未能充分发挥创新网络的合作优势。产业技术体系的系统集成与协同创新不足，产业创新生态有待进一步改善。缺乏在水平结构和技术相关结构上系统化、整体性的技术创新与集成创新。而产业技术体系所凸现的核心技术能力，往往是随着一项或几项技术突破，建立在一组先进技术有机结合的新技术群或新技术体系上，需要从国家的高度对产业技术体系进行中长期布局和政策扶持，使得我国科技创新的规模优势能够有效转化为产业生产力。

面对基础科学研究的短板和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依赖进口、容易被别人“卡脖子”的严峻挑战，一方面，我们要善于发现机遇，抓住机遇，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促进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融通创新发展，着力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另一方面，要聚焦产业链关键环节，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构建高效强大的共性关键技术供给体系，努力实现关键技术重大突破。为此，我们必须按照需求导向、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从国家发展需要出发，从过去依赖后发优势的“技术引进—消化

吸收一再创新”到打造形成更多的先发优势，以“体系—能力”为中心，加强系统化布局，破解“卡脖子”难题。

一是突出非对称赶超。系统布局“补短板”和“扬长板”重点方向和路径，发挥领先市场和技术应用场景、低成本创新和高素质劳动力、完备产业配套和新型基础设施，在部分技术领域的新型举国体制等优势。这里的“优势”，既包括在科技、经济等领域的独特优势，以及在创新体系、结构等方面的优势，也包括识别和转换“新赛场”“新赛道”及应用场景的速度优势和能力优势。

二是突出体系能力。我国的战略科技力量亟须进行从个别据点到体系化的提升。围绕持续创新能力，建立项目目标牵引，重大任务带动，基础条件支撑的组织，强化多主体协同，多要素融合，多路径推进，形成平战结合顺畅的快速响应机制，打造科技、教育、产业、金融紧密融合的创新体系。

三是突出原始创新。瞄准打造更多的先发优势，进一步强化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的原创导向，营造宽松灵活的创新环境，鼓励提出新问题、激发新思想、探索新路径，加快推进从跟踪型研究向更多开创型、引领型研究转变。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和大规模商用，加快培育成新兴产业，形成新竞争优势。

四是突出深化改革。统筹推进科技、教育、经济等关键领域关键环节改革，加快政府职能向创新服务转变，推进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造全球领先的制度优势，构建能够更快适应主动变革需要的制度。以前瞻性的制度设计全面释放创新活力，以新体制、新组织、新机制的蓬勃发育，建构制度优势。加强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青年科技人才后备军。

五是突出高地引领。遵循创新区域高度聚集规律，推动优势区域地区链接全球创新网络，促进高端创新资源的汇聚融合，成为国际化的科学高地和创新高地，带动区域创新水平整体提升。（记者郑芳芳采访整理）

【专论】促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提升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2022-01-25

2021年12月国务院印发了《“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该规划是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和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要求的具体安排。本次规划聚焦七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其中明确提出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

现代化水平”。要提升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后简称农村三产融合）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促进农村三产融合 提升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农村三产融合指的是以第一产业——农业为依托，以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及相关组织为主体，通过高新技术对农业产业的渗透、一二三产业间的联动与延伸、体制机制的创新等多种方式，将资金、技术、人力及其他资源进行跨产业集约化配置，将农业生产、加工、销售、休闲农业及其他服务业有机整合，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带来农业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的深刻变革，旨在通过实现农村三次产业协同发展，提升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让农户共享增值收益。

促进农村三产融合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的必然产物。农村三产融合是党和政府在新的历史阶段针对我国“三农”问题所提出的新的发展方向，是在新一轮农业技术革新蓄势待发、农业组织形式不断创新、消费需求持续升级等一系列背景下我国农业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近年来，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法律条例等，为我国农村三产融合营造出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大力促进了农村三产深度融合发展。

新兴技术革命是促进农村三产融合、提升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前提和基础。现代信息、生物等高新技术

向传统农业领域的有机渗透，逐步应用于农业的生产、加工、流通及销售的全过程，促使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农业之间边界逐渐模糊，形成了信息农业和生物农业等新型业态，有效促进了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提升。目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革命、以转基因为代表的生物技术革命以及以高铁为代表的交通运输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改造着传统农业的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及其管理方式，新兴技术革命积极推动着农村三产融合的产生和发展，为提升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打下坚实的基础。

新型生产经营主体是促进农村三产融合、提升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主力军。与以往以工商资本为主体，由二、三产业向农业渗透，通过整合农业资源来实现产业链条纵向扩张做法不同，农村三产融合是以农民及其相关生产经营组织为主体的，具体包括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及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其中，专业大户、家庭农场通常是以生产或养殖农畜产品为主业，在一产内部将种、养产业融合在一起，或将农业生产与农产品加工、销售等环节融合发展，或通过发展“农家乐”、休闲农业等多种形式实现产业融合。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促进农村三产融合过程中，一方面可以成为农民开展日常经营活动的指导者，帮助和指导农户制定、开展合理的生产经营计划，另一方面可以在农民与市场的对接过程中起到“桥梁”和“支

撑平台”的作用，把千家万户的分散农户与市场联系起来，覆盖到整个农业的生产、流通、分配和销售的全过程。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不断发展壮大、逐步改造升级，逐渐成为促进我国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重要主体之一。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通常分布在粮食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他们一般具有较为成熟的产业融合经验和发展模式，在技术、生产、管理及市场等多方面均具有比较优势，是促进农村三产融合、快速提升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最为强大的主体。

以更具体有效的措施推进农村三产融合

虽然目前农村三产融合在实践中的发展如火如荼，但受制于农业资源禀赋条件、从业主体特征、农业技术水平、管理体制、基础设施建设等因素，目前我国农村三产融合发展仍然面临总体层次较低，产业链条延伸不足、附加值低、利益联结机制松散、农业多功能性挖掘不够，经营主体数量多但规模小、层次低，资源整合能力、创新能力、带动能力均较为薄弱等问题。同时，人才、资金、土地等关键要素瓶颈制约，管理体制僵化、支持体系不健全不完善，相关软硬基础设施建设不适用、不充分、不平衡等问题，影响了三产融合的深入和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提升。结合现实问题，针对不同区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特色产业，本文从产业、主体、政府、机制四个方面提出如下建议：

在产业发展方面，继续深入挖掘农业的多功能性。增强农业的生产功能，通过培育和建设农产品品牌，深入发掘其品牌价值，实现品牌产品溢价销售。发展农业的生态功能，提升农业的环保价值，建设现代生态农业，提高农村三产融合层次。重视农业的文化功能，增强农业的观光价值，结合不同农村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地域特点，发展民俗风情、古宅观光、休闲农园等旅游模式，提高农业产业资源附加值。

在主体培育方面，继续鼓励各类主体加强合作、壮大实力、优势互补。加强龙头企业自身建设，以龙头企业为主导延伸产业链，促进上下游龙头企业强强联手、合作共赢，整体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水平。鼓励部分进城务工农民工返乡创业，发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带动能力，将城乡、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资源流动链接起来。积极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壮大，引导合作社联合发展机制，鼓励同质或相关的合作社积极沟通整合，在保证一定竞争的前提下实现规模效益，扩大合作社的经济技术实力。

在政府支持方面，优化营商环境，缓解人、地、钱要素瓶颈制约。完善涉农税收政策，建立健全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根据产业融合发展需要适时调整政策优惠力度，保持政策弹性。加强农村金融体系创新力度，重点关注金融服务落后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产品创新，解决农村“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

等问题。充分利用好坚持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的农村用地“三权分置”政策，在搞活农地经营权上下功夫。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农业公共服务范畴、补齐农村产业设施短板、完善农村综合性信息化服务平台和体系建设。

在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方面，优化三产融合制度环境。建立适应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管理体制，提高多部门间的有效协作。拓宽农业管理的范围，进一步深入到土地利用、农业教育、科研、推广、农村发展、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农产品加工、农产品质量标准、食品安全、生物多样性、生态安全等更加宽泛的涉农领域。赋予农业管理部门有效的管理权力和手段，通过建立起相应的法律依据，使农业管理部门发挥作为权责统一的管理部门的作用，提高管理绩效。